中國十大

帝王藏書

卷一【帝學】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中國十大帝王藏書

編　者　紀江紅

責任編輯　李明輝

裝幀設計　李呈修

出版發行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號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刷廠

開　本　16開

規　格　889×1194

印　張　72

印　數　5000（套）

版　次　2002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7-204-06549-2/J·

定　價　三百六十元（全十卷）





目次

附录……一
原序……四
札子奏……五
太昊伏羲氏……五
炎帝神农氏……七
黄帝有熊氏……七
少昊金天氏……八
颛顼高阳氏……一一
帝喾高辛氏……一一
帝尧陶唐氏……一一
帝舜有虞氏……一二
大禹夏后氏……一五
商王成汤……一七
商高宗……一八
周文王……一八
周武王……二〇
周成王……二四

汉太祖高皇帝……三二
汉太宗孝文皇帝……三三
汉世宗孝武皇帝……三五
汉世祖光武皇帝……三七
汉显宗孝明皇帝……三八
汉肃宗孝章皇帝……四〇
后魏高祖孝文皇帝……四二
唐太宗皇帝……四三
唐玄宗皇帝……四六
唐宪宗皇帝……四九
宋太祖皇帝……五一
宋太宗皇帝……五五
宋真宗皇帝……五九
宋英宗皇帝……六八
宋神宗皇帝(上)……七八
宋神宗皇帝(下)……八五

提要

【原文】

臣等谨案：《帝学》八卷，宋范祖禹撰。祖禹，字淳父，华阳人。嘉祐八年进士，历官翰林学士，出知陕州，寻谪宾化而卒。建炎二年，追复龙图阁学士。事迹具《宋史》。

是书乃哲宗元祐初，祖禹在经筵时所进。皆纂辑自古贤君迨宋祖宗务学事迹以劝讲，由伏羲迄宋神宗，每条后间附论断；自上古至汉唐二卷，自宋太祖至宋神宗六卷，于宋诸帝叙述独详，盖亦本法祖之意以为启迪也。

祖禹初侍哲宗经帷，因夏暑罢讲，即上书论今日之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而力陈宜以进学为急；又历举人主正心修身之要，言甚切至。史称其在迩英时，守经据正，献纳尤多。又称其长于劝讲，平生论谏，数十万言。其开陈治道，区别邪正；辨释事宜，平易明白，洞见底蕴，虽贾谊、陆贽，不是过。

今观此书，言简义明，敷陈剀切，信有不愧史臣所言者。惜哲宗昧于省察，不知学古有获之义，终致更张初政，国是混淆。而祖禹忠爱之忱，惓惓以防微杜渐为念，其立论可谓深切著明，于帝王典学之旨，实能有所裨益焉。

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 纪昀

臣 陆锡熊

臣 孙士毅

总校官：臣 陆费墀

【译文】

总纂官、总校官等在此谨作如下说明：

《帝学》一书共八卷，宋人范祖禹编著。范祖禹，字淳父，华阳县（今四川成都）人。宋仁宗嘉祐八年（一〇六三年）进士，做官并逐渐升迁至翰林学士。后出朝到地方，任陕州知州。不久，因事被贬官，降职为宾化县令，死在任所。宋高宗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朝廷为其平反，追复龙图阁学士职务。范祖禹的生平事迹，记载在《宋史》里。

本书是宋哲宗元祐（一〇八六——一〇九三年）初年，范祖禹在担任为皇帝讲解经史的经筵讲官时，进呈给皇帝的。书中收集编辑的都是从上古贤明的君王直到宋朝开国太祖、太宗以来历代皇帝学习方面的事迹，目的是用此书中的故事来对皇帝进行劝告讲解，以增加他的学识和能力。书中所选辑的故事，从伏羲开始到宋神宗为止，分条目罗列，每条后附有作者的评论。本书八卷中，自上古至汉唐为二卷，自宋太祖到宋神宗为六卷。之所以对宋朝各位皇帝务学事迹叙述特别详细，其目的也在于让读这本书的宋朝的皇子皇孙们效法祖宗，对自己的政治有所启迪。

范祖禹初到哲宗书房作讲官时，见夏天一遇暑热就停止讲习，于是上书给当时还是太子的哲宗，说明今天的学与不学，关系将来国家政治的稳定与动荡，极力劝说哲宗应当把学习看做不可拖延的事；同时又一一举出作为皇帝、国家最高统治者，他在政治判断力和自身道德修养方面应当具备的主要素质，言辞非常深刻。史书中记载说，范祖禹在迩英阁任职时，按照经传记载前人经验。从不偏不倚的立场，对朝廷政事提出的供采纳的建议特别多。还说，范祖禹擅长劝讲，在他一生中，上书皇帝，评论朝廷政治当否得失的疏奏有数十万言之多。他在评论国家的政治措施时，立场鲜明，区别邪正，是就是是，非就是

非；他对于日常事务的辨别和解释，平易明白，且能看透事物最深层的本质。就是像汉代的贾谊、唐朝的陆贽这两位历史上有名的政治评论家，也不过如此。

如今读过这本书，感到文字言简义明，叙述切中事理，相信范祖禹其人确实不愧史臣对他的评价。遗憾可惜的是宋哲宗愚昧，糊涂无知，不能反省，不懂得学习历史能够对现实统治有所帮助这样的道理，最终导致了改变他即位之初的先帝所行之政治制度，结果使国家政治事务失去了准则。而范祖禹以一片忠君爱国的情意，以防微杜渐为出发点，恳切陈词，他所阐述的观点可以说既深刻切实又显著明白，这些观点对于帝王及其子孙们把握学习中的要领，确实是能够有所裨益的。

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纪昀　陆锡熊　孙士毅

总校官：陆费墀

原序

【原文】

《帝学》一编，元祐中，太史范公劝讲金华，摭取帝王务学求师之要，自宓羲迄于我宋，厘为八卷上之。玉音嘉纳，缉熙光明，于斯为盛。其五世孙择能宰高安，刊置县斋，未几散逸。户曹玉牒汝洋一日访得元本，因俾锓木，以补道院之阙，庶永其传。

嘉定辛巳季夏望日，青社齐砺书。

【译文】

《帝学》一书，是元祐年间，太史范祖禹公在金华殿作哲宗侍讲官时，摘取经史中帝王学习和求师的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和教育意义的故事，上起自宓羲时代，下直到我大宋王朝，整理编辑为八卷上呈皇帝以勉励皇帝向历代圣贤君王学习的著作。哲宗接受了此书，并赞赏了范祖禹的做法。作为一个贤明的君主，经过长期日积月累的学习，哲宗的修养素质，到这时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此书在范祖禹的五世孙范择能任高安县知县时，曾亲自进行校核订正，保存在县衙的书房里。但没有过多久便散落遗失了。户曹参军、宋宗室名叫赵汝洋的人，某日搜集到此书最初的稿本，于是将稿本交付雕版印刷。这样一来补上了州署未藏此书的缺憾，同时也使《帝学》一书可以长远地流传下去。

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一二二一）七月十五日，青社齐砺书。

札子奏

【原文】

建炎四年七月，朝散大夫、试礼部尚书臣谢克家等札子奏：

臣等伏见故翰林学士范祖禹，当元祐中终始实在经筵，所著《唐鉴》既已进御外，有《仁皇训典》及《帝学》二书，有益治道，可备睿览。

今祖禹之子，前宗正少卿冲，寓居衢州。伏望圣慈下本州，给以笔札，令冲勘读投。

【译文】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一一三〇年）七月某日，朝散大夫、试礼部尚书谢克家等人进呈札子奏称：

我们了解到已故翰林学士范祖禹，在哲宗元祐年间始终在经筵任皇帝的侍讲官。他的著作除已经进献给皇帝阅读的《唐鉴》以外，还有《仁皇训典》和《帝学》两部对国家的治理有帮助，可以收集来随时供皇上参阅。

现在范祖禹的儿子，前任宗正少卿范冲，正暂居于衢州。我们希望皇上能将您的关怀下达到衢州，给以笔纸等经费，命令范冲将两书校对核定后呈递入朝。

太昊伏羲氏

【原文】

太昊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上古结绳而治，伏羲始作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臣祖禹曰：伏羲氏德合天地，通于神明。始画八卦，以开物成务，故孔子言《易》始于伏羲；肇有书

契，以纪万物，而治道可传于后，至尧而大备，故孔子序《书》始于尧。其前岂无圣人哉？盖其世远，不可以为法也。杨雄曰：『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尧。匪伏匪尧，礼义哨哨，圣人不取也。』后世帝王之学本伏羲，故臣以为《帝学》之首。

【译文】

太昊伏羲氏，仰头观察天空中日月星辰天体运行、风霜雪雨寒暑变化等自然现象，低头观察地面上山川河流、动物植物等自然风貌，观察飞禽走兽身上的花纹，观察地上各种各样自己认为适合于参考的东西。通过观察探究，受到感悟，于是近从自己的身体上，远自周围的环境中，把所见到的事物按属性分类，分别以八种不同的符号来表示，创制了八卦。通过八卦的演绎，来了解神明的意志，来模仿万物的情状。

上古时代，人们用结绳记事的办法彼此相互沟通，以保持生存的稳定。伏羲发明了文字，能更细致、更准确地描绘和记录事物。于是官吏们可以通过文字来管理属下的臣民，而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也可以借助于文字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了。

臣范祖禹说：伏羲氏德性与天地相符合，与神明相贯通，他发明了八卦，用以揭露事物真象，使人事各得其宜，所以孔子在谈到《易经》时，从伏羲开始；他又创造了文字，用来记录人世间的一切事物，从而使治理天下的各种方法可以借助文字记载而传于后世，直至唐尧时代基本完备，所以孔子在为《尚书》编次时以唐尧作为开端。这样看来，在伏羲之前，在唐尧之前，岂不是没有圣贤了吗？其实并非如此，只不过是因为时代过于久远，人们不可能拿他们作为榜样来效法罢了。杨雄曾说过：『管理国家的制度，人们思想道德和行为的规范，是从伏羲时代才产生、到唐尧时期才完备的。所以如果不是伏羲，不是唐尧，

尽管谈论礼义的人多得是，但孔子都不采纳他们的说法。』正是因为孔子删《诗》、《书》之后，后世帝王的学习都以伏羲为渊源，所以我也把伏羲的事迹放在《帝学》一书的篇首。

炎帝神农氏

【原文】

炎帝神农氏，师曰悉诸。

【译文】

炎帝神农氏的老师名叫悉诸。

黄帝有熊氏

【原文】

黄帝有熊氏，幼而徇齐（徇，疾，齐，远也。言圣德幼而疾远），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师曰大桡（大桡，作甲子者）。又学子大真。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

【译文】

黄帝有熊氏，小时候即天生的聪明伶俐，凡事想得快，做得快。年龄稍长，性格又敦厚善良，并且勤奋好学。特别是成年后，他具有良好的学识和修养，对所见所闻有敏锐准确的判断力。黄帝求学时的老师名叫大桡，他也曾经拜大真为师学习过。

记载伏羲、神农、黄帝事迹的书，后人把它们称作『三坟』。

少昊金天氏

【原文】

少昊金天氏以鸟名官。凤鸟氏历正（凤鸟知天时，故以名历正之官），玄鸟氏司分（玄鸟，燕也。以春分来，秋分去），伯赵氏司至（伯赵，伯劳也。以夏至鸣，冬至止），青鸟氏司启（青鸟，鸧鹒也。以立春鸣，立夏止），丹鸟氏司闭（丹鸟，垍雉也。以立秋来，立冬去，入大水为蜃。上四鸟皆历正之属官），祝鸠氏司徒（祝鸠，鹪鸠也。鹪鸠孝，故为司徒，主教氏），鴡鸠氏司马（鴡鸠，王鴡也。挚而有别，故为司马，主法制），鸤鸠氏司空（鸤鸠，鹄鵴鸟也。鸤鸠平均，故为司空，平水土），爽鸠氏司寇（爽鸠，鹰也。挚，故为司寇，主盗贼），鹘鸠氏司事（鹘鸠，鹘鸼也。春来冬去，故为司事），五鸠，鸠民者也（鸠，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鸠为名），五雉为五工正（雉有五种：西方曰鷷雉，东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垍雉），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有九种：春扈鳻鶞，夏扈窃玄，秋扈窃蓝，冬扈窃黄，棘扈窃丹，行扈唶唶，宵扈啧啧，桑扈窃脂，老扈鴳鴳（以九扈为九农之号，各随其宜，以教民事），扈民无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鲁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叔孙昭子问焉，曰：『少昊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自高阳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闻之，见郯子而学之，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然则古圣人之建官立事，必本于学也』）。

【译文】

少昊金天氏以鸟名作官名。掌管历法的长官名凤鸟；掌管报告春分、秋分的官名玄鸟；报告夏至、冬至的官名伯赵；报告一年一度立春时节到来，要开始进行农事活动的官名青鸟；报告秋冬到来进入秋收冬藏的官名丹鸟。把后世称为司徒，掌管土地和人民，负责征发徒役的官名为祝鸠。把后世称司马，掌管军队和法制的官叫做鴡鸠。把后世称司空，掌管工程建设的官叫做鸤鸠。把后世称司寇，负责缉捕盗贼、掌管刑狱、纠察的官叫做爽鸠。把掌管营造之事的官叫做鹘鸠。这五个以鸠命名的官员，他们的职责是把人民聚集起来，在统一意志的管理下进行有秩序的社会活动。以五种雉鸡来称呼管理木工、陶工、金工、皮工、彩绘工五种工匠的长官。他们的职责是校正丈尺之度、斗斛之量，以便利人们在统一、公平的标准之下使用这些器具。以九种扈鸟来称呼管理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等九种农事活动的官员。这些官员的职责是约束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的行为，使人们不致过于散漫。

【原文】

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使重为句芒（木正），该为蓐收（金正），修及熙为玄冥（二子相代为水正），世不失职，遂济穷桑（穷桑，少昊之号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职，济成少昊之功，死皆为民所把。穷桑，地在鲁北。晋顷公十四年，魏献子问于蔡墨曰：『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对曰：『少昊氏有四叔，为句芒、蓐牧、玄冥，此其三把也。颛项氏有子曰黎，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龙，为后土，此其二把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把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把之。』

臣祖禹谨案：《周礼》：『内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春秋之时，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

丘，是其书犹存也。盖自孔子删《书》，断自唐虞，不纪三皇，而《周易》系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之事；孔安国以伏羲、神农、黄帝之书为『三坟』，少昊、高阳、高辛、唐、虞之书为『五典』；司马迁作《史记》，以黄帝为五帝之首，高阳、高辛次之，尧、舜次之，而少昊氏不纪；考其制作法度，自高阳已不能及。四子修职，皆百世把，少昊之德，岂非学之至乎！臣故取左氏《传》、郯子、史墨之语，以补少昊氏之事，备三皇五帝之学焉。

【译文】

少昊氏有四位叔父，名叫重、该、修、熙，他们具有管理金、木、水三方面事务的能力。于是少昊任用重为句芒(管理木工事务的最高长官)，任用该为蓐收(管理金工事务的长官)，任用修和熙为玄冥(管理水工事务的长官)。四人终身尽职地担任这些职务，辅助少昊成功地治理着穷桑之地。

臣范祖禹谨作说明如下：《周礼》记载：『内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春秋时期，楚国的左史倚相，能读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书，这样看来，在当时(春秋时期)这些书还都在世上有所存留。但是，自孔子删选古史编撰《尚书》，把记事的起始断在唐尧、虞舜时期，不记三皇事迹；而《周易》中记载的是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等上古时代的事；孔安国《尚书·序》把记载伏羲、神农、黄帝三代史迹的书称为『三坟』，把记载少昊、高阳、高辛、唐尧、虞舜时事迹的书称为『五典』；司马迁作《史记》在《五帝本纪》中把黄帝记为五帝当中的第一个，接下来是高阳、高辛，再接下来是尧、舜，而少昊氏则未予记载。因此，我们在依史籍来考证上古时代的制度法令、礼仪风俗时，至高阳氏就无法再向前追溯了。少昊氏时代的重、该、修、熙四人，都能很好地履行他们的职责，因而都被后人视为神而长期祭祀，从这里可以看出，少昊氏的品德性格，他的治世之道，难道不正是我们要学习的最高境界吗！所以我在《帝学》一书中，从《左传》以

及郑子、史墨的言论中，摘取了一些材料，用它们来补上《史记》等书中未记的少昊氏的事迹，以便让三皇五帝之学完备起来。

颛顼高阳氏

【原文】

颛顼高阳氏师曰伯夷，又受学于绿图。

【译文】

颛顼高阳氏的老师名叫伯夷，又曾拜绿图为师学习过。

帝喾高辛氏

【原文】

帝喾高辛氏，聪以知远，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师曰伯招。

【译文】

帝喾高辛氏，见多闻广，对于很远地方的情况也能知道；辨别力强，对于微小的事情也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他在管理国家事务中）对臣民宽厚仁慈因而很有威望，对百姓能使他们获得实际利益因而很得人们的信赖。正是由于他如此地注意自身的修养，所以天下的人都服从他的统治。他的老师名叫伯招。

帝尧陶唐氏

【原文】

帝尧陶唐氏，聪明文思，光宅天下。若稽古，钦明文思安安。益曰：『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

文。』师曰子州支，又学于君畴。孔子曰：『尧焕乎，其有文章。』

【译文】

帝尧陶唐氏，见闻广博，具有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和足智多谋的处理国家事务的能力，这些使他的威望传播于天下。顺考古之治道而言，则帝尧所奉行的是『以敬明文思四德来安定天下之当安者』。伯益曾赞美说：『帝尧的圣德传布既广且远，达到了无所不通，神妙无方的地步，能够文经天地，武定祸乱。』帝尧的老师名叫子州支，还就学于君畴。孔子说过：『尧的事业和名声之所以如此显赫，是因为他制定有一套完备的礼乐法度。』

帝舜有虞氏

【原文】

帝舜有虞氏，若稽古，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师曰许由。学于务成昭。务成昭教舜曰：『避天下之逆，从天下之顺，天下不足定也。避天下之顺，从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又曰：『舜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少昊、高阳、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

【译文】

帝舜有虞氏，作为君王，他奉行『顺考古道而行之（按照先古贤明君王的办法来处理政务）』的统治之术。他具有深邃博大的智慧和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他性格温和，行为端庄而有礼貌，充满诚信。帝舜的老师是许由，他也曾向务成昭学习过。

务成昭曾这样教导帝舜：『(作为君王)如果你在处理国家事务时总是回避天下臣民反对的事而只去做臣民愿意的事，那样并不足以安定天下；相反，假如你避开只知顺从你的人而听取持反对意见的人的主张去做，也不见得就会失去天下。』

孟子说过：『大舜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他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能够放弃自己的主张而服从别人。他乐于采纳别人的意见去做于人民有益的事，从他作为耕稼陶渔的普通生产劳动者直到做了帝王，他没有不这样做的时候。采纳别人的意见而去做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就是同别人一道做好事。』孟子还说过：『舜每每听到别人提出一个好的建议，看到别人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他那赞赏和恨不得立即实行的劲头，就像江河决口而冲出的大水，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

记载少昊、高阳、高辛、唐、虞等时代史迹的书，后世将它们称作『五典』。

【原文】

臣祖禹曰：帝王之学，谓之大学。《礼记》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故学者所以『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尧舜之道是也。帝王之学，所以学为尧舜也；尧舜亦学于古先圣王而已。其在《易》曰『进德修业，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其在《书》曰『若稽古』，其在《诗》曰『正家以风天下』。此文王之学也。扬雄曰：『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后世学尧舜而及之者惟文王，故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习周公』，其他皆非道也。

【译文】

臣范祖禹认为：帝王所要学习的东西，人们称它作『大学』，即治理国家的学问。《礼记》里讲道：『所谓治理国家的学问，它的核心在于向臣民显示出你作为帝王的高尚的德行；在于使自己的行为处于至善的境界。知道自己的行为应当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就有了标准，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停顿下来，在标准处保持着就可以安下心来，心安了才能考虑更多的事情，而凡事前前后后考虑周到了自然会有收获从而知道如何去处理。自古以来，那些想要向天下之人显示自己圣明美德的人必须先把自己的领地治理好；而要想治理好自己的领地，那你必须先有本领管理好你的家庭；而要管好一个家庭，则必须先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要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必须先使自己的思想正直、没有偏斜；而要想使自己具有正直和公正的心，必须先有真诚的心意；而要使心意诚实则须先知道事物的善恶吉凶和造成这些不同事物的原因和结果。要想了解善恶吉凶不同事物的来龙去脉，就得去接触这些事物，接触的事物多了自然对它们的起源和结果就会了解了；了解了事物的底细知道了事物的利与害，就会产生甄别是非的意愿；有意愿又明是非才能有公正的心；心正了处理事物不带偏见了才能达到较高的自身品德修养；有了良好的修养进而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庭能够管理好，推而广之，才有可能领导好自己领地之内的事务；而只有把自己的领地内的事务处理好，才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取得人们的信任和提高自己的威望，从而达到统治整个天下的目的。』由此可见，在学习过程当中所提出的『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这些不同阶段的道德和能力的要求，正是尧舜这些圣明君王的所作所为啊！

帝王们的学习，目的在于通过学习使自己成为尧舜一样的圣君；而尧、舜呢，他们也都是向更古的

先圣明王学习来的。这种现象，在《易经》中被说成是『要使自己的道德修养能有所长进、使自己的本领有所提高，就要通过学习把前人（有关这方面的）成就和经验汇集在一起，并通过问难的形式反复讨论以理解其真谛』；在《尚书》中则被说成是『顺考古道而行之（凡事先看看古之圣明君王是如何处理的，然后按照他们的方法去做）』；在《诗经》中则把它解释为『整治好自己的家以作为天下人的榜样』。上面说到的就是文王的治学之道。

汉代扬雄说过：『能够与尧、舜、文王之道相适合的道才是正道。』自尧、舜而后为天子而向尧舜学习并且成为尧舜那样圣明帝王的唯有周文王一人而已。所以孔子在著《春秋》谈到古之圣明君王治世之道时，就是从唐尧、虞舜说起，而后是周文王、周武王及周公旦，因为他认为其他君王的统治都不能称为『道』。

大禹夏后氏

【原文】

大禹夏后氏，若稽古，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闻善言则拜，思日孜孜。作训以戒子孙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又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禹为人敏给克勤，恶旨酒而好善言。师曰大成挚，学于西王国。禹惜寸阴（为善曰不足也），见耕者耦，立而式（二人并耕曰耦。式，车敬耕者也），过十室之邑必下（下车也）。十室之邑，以其必有忠信，故下之）。

【译文】

大禹夏后氏，顺考古道而言之，他既将文德教命远播于四海，又恭敬虔诚也继承了尧舜两帝开创的基业，统治之道可谓周备。他每听到好的建议都恭敬地请教，日日思考不敢稍有懈怠。他曾作训这样告诫子孙：『对于在你统治之下的臣民百姓，你可以亲近他们，但不可以卑贱轻视他们，使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否则人们怀有怨气，服从君王统治的心就会动摇）。老百姓是邦国的根本，根本稳固邦国才会安宁。我看待天下的臣民百姓，即使是最普通的愚夫愚妇，都认为能胜过我。一人之身，三度有失，凡有过失，即会被别人怨恨。这种怨恨的产生，岂只在明显的大事上，大的过失都是由小事而引起的。可以在事情还处于不易看到的细微之时，就应当预作图谋。我作为帝王，处在君临亿万臣民百姓之上的地位，总是担心人们对自己产生怨恨，终日战战兢兢总有种危惧的感觉，就好比是用一根腐朽的缰绳驾驭着六匹骏马拉的车子，一旦缰绳断了，马就会逃散。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百姓的统治者，我怎么敢不敬畏他们，怎么敢不谨慎行事呢！』禹还告诫说：『在宫廷内为女色所迷乱；在外沉缅于田猎游玩；整日没有满足地吃美酒、听舞乐；安居于雕梁画栋的华丽宫殿里，这样贪图享乐的事只要沾上一件，那你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

大禹为人敏捷而勤奋，厌恶吃吃喝喝、花天酒地；而喜欢倾听采纳人们好的建议。他的老师是大成挚，曾在西王国学习。禹对于每一寸光阴都非常珍惜，惟恐做对人民有益的事的时间不够。每当在出行道中见到在田地里耦耕的农民，他都要从车上站起身来向他们致意；每次经过住有十户以上人家的村落，他都要下车去看看，抚慰一番。

商王成汤

【原文】

商王成汤，不迩声色，不殖货利。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昧爽丕显，坐以待旦。作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汤三往币聘之。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如己，推而内之沟中，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汤学于伊尹而后臣之。《商颂》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是汤之德也。

【译文】

商王成汤，为政清简廉洁，不近声乐女色，不贪资货财利，以义来约束行为益人，以礼来规范人心向善。每每在黎明时想到要将自己为政之道在天下广为传布，故迫不及待眼睁睁地等着天明好去实行自己的愿望。他在沐浴用的盘上刻了这样的铭辞来告诫自己：『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伊尹是个在有莘氏部落居住的地方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奴隶，但他却非常乐于谈论尧舜这些圣明帝王的统治之道。成汤听说后，三次带着财帛等礼物亲自上门去请他出来帮助自己治理国家。伊尹想到天下那些像自己一样享受不到尧舜等贤明君主泽惠的老百姓，毅然把财帛推到沟中，挺身而出，接受请求去辅佐成汤，劝说成汤讨伐无道的夏桀，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成汤由此从伊尹那里学到了很多道理，并把伊尹任用为重要的辅臣。

《商颂》里这样赞道：『成汤为王，尊贤下士毫不拖延迟缓；他那种圣明恭敬的品德和做法，天天都只见增多而从没有减少；他以自己的聪明宽待天下之人，使百姓有闲暇而舒缓的日子；上天因此对成汤爱敬，以天之命令来使成汤用事于九州而为天下之王。』这颂词正是成汤高尚品德的写照。

商高宗

【原文】

高宗得傅说以为相。王曰：『来，汝说！台小子旧学于甘盘。』（甘盘，贤臣，有道德者）。说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惟斆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

【译文】

高宗得到傅说这个有才能的人，任用他为辅佐朝政的大臣。（一天）高宗说：『傅说，你过来，我过去当王子时是跟着甘盘学习的。』

傅说勉励高宗道：『大王，人们都想知道得多一些。这就是说凡做事，学学古人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就会有所收获。不效法古训去做事，还想能够长久延续下去，这种道理我傅说没有听说过。学习应当顺着求善求美的本质去做，而且学起来就要相符，这样，去做学习的美好目标才会到来。怀着这样的学习志向，那么你想学到的东西就会归向你自己。教是学习的一半。你的念头始终常在学习上面，那么你的知识和修养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增长和提高了。借鉴和参考先王所制定的法令和规章去处理政事，这样做永远不会出错。』

周文王

【原文】

周文王在傅弗勤，处师弗烦，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伏羲画八卦，文王演之为六十四）。太公吕望，避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往归之，文王以为师。

《大雅》曰：『亹亹文王，令闻不已』（亹亹，勉也。其善声闻，无止时也）。又曰：『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穆穆，美也。缉熙，光明也）。又曰：『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倬，大也。云汉在天，其为文章，辟犹天子为法度于天下）。周王寿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为政，先以心研，如睹金玉然。言其政可乐也）。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又曰：『雝雝在宫，肃肃在庙。』（雝雝，和也。肃肃，敬也）。又曰：『不闻亦式，不谏亦入。』（性与天合）。

《小雅》曰：『《伐木》，燕朋友故旧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此文王燕朋友之诗）。

单襄公曰：『文王质文（言质性，有文德），故天祚之以天下。』

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孔子，学文王者也。』

【译文】

周文王作傅时不忧愁，为师时不烦乱，即使被囚羑里，仍然不但不灰心丧志，反而专心演绎《周易》，将伏羲所创制的八卦，增加为六十四卦。姜太公吕望，当时正为躲避商纣王的暴政而隐居于东海之滨。他听到文王事业正在逐渐振兴，已有取商而代之的迹象的消息，就前往西岐投奔文王，文王大喜过望，拜太公为师傅。

《诗经·大雅》中歌颂道：『勤勉不倦的文王，以他的勤行而使善名远播，令人赞誉不已。』又道：『具有天子美容的文王，他的光明之德是人们敬仰的极至。』又道：『巨大无边的银河在天空中排列成美丽的文章，就好比地上的君王为法度于天下。周文王以九十余岁的高龄执政，要改变商纣的暴政恶俗，近乎重新做人。细心雕琢出精美的图案，使金玉器具的造形与其质地一样美好，令人喜爱。努力勤行善道的

文王，用他的圣德来维护着社会的秩序和国家的法纪。』又说：『文王德行很高。在家室他容貌和顺，在先祖之庙则严肃恭敬。』还说：『文王性与天合，用人只看其才能不求完备。在祭礼宗庙时，有仁义之行而不闻名的人也用来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谏争的人也允许进入。』

《诗经·小雅》记载：『《伐木》这篇诗歌，记的是设宴招待朋友故旧的情形。上自天子下到普通百姓，没有不需朋友的帮助能够干成事业的人。』

单襄公说：『周文王这个人，在人性本质上即有文德，所以命运才将执掌整个天下的帝王之位给予他。』

孔子说：『周文王虽然已经死了，但他所奉行的文德之道，不正是还在我身上吗！』于是他毅然以商汤文武治道的继承者自称，着手著《春秋》，担当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传道士的重任。孔子的弟子子贡评论其老师的作为说：『（正是孔子的行为）使得周文王、武王实行的制度法令，没有消失。孔子正是学习和继承文王之道的人。』

周武王

【原文】

武王师太公，号曰师尚父（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王践治三月，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高阳之道有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斋矣。』三日，王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负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师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且臣闻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退而为戒，书于席之四端为铭焉，于几为铭焉，于鉴为铭焉，于盥盘为铭焉，于楹为铭焉，于杖为铭焉，于带为铭焉，于履屦为铭焉，于觞豆为铭焉，于户为铭焉，于牖为铭焉，于剑为铭焉，于弓为铭焉，于矛为铭焉。

于席前左端之铭曰『安乐必敬』；前右端之铭曰『无行可悔』；后左端之铭曰『一反一侧，亦不可忘』；后右端之铭曰『所监不远，视迩所化』；鉴之铭曰『见尔前虑尔后』；盥盘之铭曰『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之铭曰『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伤，其祸将长』。杖之铭曰『恶乎危于忿懥，恶乎失道于嗜欲，恶乎相忘于富贵』。带之铭曰『慎戒必恭，恭则寿』。剑之铭曰『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矛之铭曰『造矛造矛，少间弗忍，终身之羞』。予一人所闻，以戒后世子孙。

既克商王，访于箕子，作《洪范》。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用训，於王曰：『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与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异兽不育于国。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呜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译文】

周武王的老师姜太公号师尚父。武王即位三个月后，召见师尚父并向他询问道：『黄帝、高阳氏等先古明君的治国之道到底有没有？要有，为什么我见不到呢？』师尚父回答说：『有。都记载在丹书里。大王您如果想知道，那就请沐浴更衣先行斋戒之礼。』

斋戒三天礼毕，武王身着礼服王冠，于宫中再次召见师尚父。师尚父也是一身礼服穿戴，手捧丹书进殿，背对屏风站下。武王走下堂来，面朝南站着。师尚父说：『按照先王的制度，王不能面朝北视事。我现在宣读丹书，等于代表先王说话，所以也不能面朝北。』武王便向西走了几步，又往南走几步，转身面向东站住。于是师尚父面西朝东对着武王，为武王读丹书。丹书里这样说：『作为帝王，处理国家日常事务，如果恭敬勤奋的势力胜过懒惰享乐，那是好现象；但如果懒惰贪图享乐的势力超过了敬业勤奋的势力，就有亡国的危险。同样，如果处理政务能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以个人的欲望为出发点，那就应当去做；而如果在出发点这个根本原则立场上个人的欲望胜过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那就肯定没有好的结果。而且我曾听说过：『作为帝王，如果他统治天下的地位是依靠实行仁政，获取民心得来的，他仍然以实行仁政来保持他的统治地位，那么他的王国能长久流传，百世而不衰；如果他的帝位是通过武力得到的，倘若他能实行仁政来维护，那他对王国的统治能保持十世；而如果一个帝王，他的地位是用暴力获取的，同时他又以暴力手段来统治，那他的王国恐怕连一世也维护不了，在他自己的统治期间就会被人推翻。』

武王听罢丹书中先古明君的这番教导，引起了自己的警惕和恐惧。回到起居处后，把自己由此而产生的许多感想制成诫语，刻写在座席的四端，刻写在几案上，刻在镜子上，刻在洗浴盘上，刻在柱子上，刻在手杖上、腰带上，并且鞋子、酒具、门、窗、剑、弓、矛上都写刻诫语，时时处处事事提醒自己。

在席的前左端刻的是『安乐必敬（居于安乐，行为必须恭敬，不可傲慢得人）』；在席子的前右端刻的是『无行可悔（事情做过是不能后悔的）』；席的后左端刻的是『一反一侧，亦不可忘（对于先王的教诲，即使在睡觉翻身时，也不能忘记）』；席的后右端刻的是『所监不远，视迩所化（作为借鉴的事离你并不远

——指夏桀、商纣的亡国，要时常看看自己近来的作为）』；镜子上刻的是『见尔前，虑尔后（凡事既要看到你眼前能够看到的，也要考虑到你身后看不到的）』；洗浴的盘上刻的是『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溺于人不可救也（与落入别人设置的圈套相比，宁可落入深深的水潭中。落在水潭中还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游水自救；而倘若落入别人的圈套，那就只有任人宰割了）』。在柱子上刻的是『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伤，其祸将长（不可随便残害别人，那样的话，会很快招致祸事；也不可随便出口伤人，那样会招致人的怨恨，埋下给自己造成灾难的长期隐患）』。在杖上刻的是『恶乎危于忿懥，恶乎失道于嗜欲，恶乎相忘于富贵（最令人厌恶的行为是由于愤怒而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由于纵情享乐而失去道德，由于富贵而忘掉了朋友）』。衣带上的警语是『慎戒必恭，恭则寿（待人做事一定要谨慎小心、恭恭敬敬，为人恭敬有礼，心态平和，就能长寿）』。剑上刻的是：『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剑带在身上，是把它看做是服饰的一部分的。如果你要动用它，那就必须是行德，是代表正义去惩罚邪恶。为此而用剑你的事业当然会愈加兴盛；如果违背这个原则而动用武力，那你的事业将崩溃）』。矛上刻的是『造矛造矛，少间弗忍，终身之羞（矛啊矛，是对立两方的象征。为人处事，如果与人稍有矛盾就不能容忍，那弄不好就会造成终身的屈辱）』。所有这些警诫的话，不只是要让我自己一个人时时记着，而且还要用它们来劝诫我的后世子孙。

周武王率军打败商纣王后，将箕子带回镐京，向他请教帝王统治国家的方法，箕子于是著《洪范》详细叙述『天地之大法』。西戎旅国得到周武王战胜商朝，派人进贡来名叫獒的大犬。太保召公为此而作《旅獒》一篇，论述贡獒这件事的意义，用以劝谏武王。文中说道：『作为德行威望都已很高的君王，要懂得自敬自重，不去做轻狎侮慢的事。如果你侮慢了君子则君子不肯尽其心，如果侮慢了小人则小人不肯

尽其力；君子不尽心小人不尽力，则国家的事就必不能成功。不使声色迷惑耳目，则处理百事的尺度都会是公正的。而如果以声色自娱，必然要玩弄人物；谁玩弄别人就会使他自己丧德，谁玩弄外物则将使自己丧志。人和物既不可玩弄，则应当以道德为标准来约束自己。志当以道而宁身，言当以道而接物；依道而行，则志自得而言自当。不去花费精力财力作无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不让这类事妨碍你做有益的事，这样就会有所成就。不去把稀奇的东西看得很贵重而把有用的物品看做不值钱的东西，这样就有利于鼓励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而老百姓的需要就能得到满足。狗呀马呀等家畜，如果不是土生土长的就不要养，因为即使养了也不一定适合使用；珍禽异兽也不要在国家的园囿中饲养，免得浪费钱财，你不稀罕边远地区出产的物品，不要求他们进贡，不侵害他们的利益，远方的邦国自然服从你的统治；而倘若你十分看重任贤使能，那你周围的人也就会安心了。呜呼！作为帝王就应当早起夜寐勤施德政。倘若不注意细微言行，常出现一些小的过失，时间久了，终将会损害大德的形象，就好比是堆九仞高的一座山，只差一筐土而不能完成，那太令人遗憾了。

周成王

【原文】

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践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使之与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是故知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然后能使人。

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保谓安守之）；傅，傅之德义（傅犹敷也）；师，导之教训（师傅之教大同也）。师主于训导，傅即受而述之。《书·序》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盖周公复政，留为太师），此三公之职也。天子疑则问，问则应而不穷者谓之道，道者导天子

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诚立而敢断，辅善而相义者谓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过谬邪者谓之弼，弼者拂天子之过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闻强记，敏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听朝，则四圣维之，是以虑无失计而举无过事。作颂曰：『惟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

召公作诰曰：『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又曰：『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谋自天。』又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周公作《洛诰》，王拜手稽首以求诲言。周公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无若火始焰焰，厥攸灼叙，弗其绝。乃惟孺子，颁朕不暇，听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时惟不永哉！』

又作《无逸》，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诪张为幻。』周公曰：『呜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

又作《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

虎贲』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又曰：『呜呼，孺子王矣。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准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乱，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时则勿有间之。呜呼，子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继自今，后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王作《周官》以训百官曰：『学古人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其尔典常作之师，无以利口乱厥官。』又曰：『不学墙面，莅事惟烦。戒尔卿士，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

臣祖禹曰：夏为天子，十有七世四百三十有二年。商为天子，三十有一世六百二十有九年。周为天子，三十有六世八百六十有七年。三代一千九百二十有八年。其君以学见于经传者，唯禹、汤、高宗、文、武、成王而已，可谓至少也。若夏之启与少康，商之祖甲、中宗、祖乙、盘庚，周之康王、宣王，皆有功烈见于《诗》《书》，非学亦不能至也。虽载籍缺略，事远难明，然要之，圣君少而庸君多，故治日短而乱日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学则无闻于后，人君可不勉哉！如夏之桀、商之纣，昏乱其德，覆宗绝祀，后世言恶则必稽焉。岂其性不可为善哉？由不法先王、不亲贤、不务学也。《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圣狂之分，惟在念与不念而已。可不戒哉？

【译文】

〔周武王去世时〕周成王的年龄还很小，不能临朝执政，周公旦便以宰相的身份暂时即位为国王，代表成王行使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他列举世子法的有关规定给伯禽，要伯禽和成王一起居住和学习，想用这种办法使成王逐渐地懂得父子、君臣、长幼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是以什么样的礼节相处，又是按照怎样的规定来行事的。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实际生活的锻炼，要使成王懂得：只有知道如何作别人的儿子才能去作别人的父亲，只有知道如何做好一个臣民才能去作国君；只有知道如何为别人做事才能去指

使别人做事。

召公奭任成王太保，周公旦任太傅，太公吕望任太师。所谓『保』，即以道德礼义来教育天子，以保证其身心健康；所谓『傅』，即向天子传授德义；所谓『师』，即以古往明君行政的经验来对天子进行劝诫教导。这就是『三公』的职责。

天子有不明白的事就向他询问，而凡是被问到的事情他都能滔滔不绝地做出回答，具备如此渊博知识的人被称为『道』；道的意思（职责）就是用道义来引导天子行事；在朝堂上，他常常站位于天子的前面。周公旦所担任的就是这个职务。以真诚立身，具有果敢的判断能力，辅佐天子做善事义事的人称为『充』；充的意思（职责）就是充实天子的志气，在朝堂上，他总是站位于天子的左侧。太公吕望所担任的就是这个职务。为人廉洁，性格切直，遇事敢于犯颜直谏，专门纠正错误的行为和荒谬的言论的人称为『弼』；弼的意思（职责）就是用诤言来阻止天子的过失。在朝堂上，他通常站位于天子右侧。召公即担任此职。见多识广，记忆能力特强，行动机敏且善于应对的人称为『承』，承的意思（职责）是接续天子的遗忘，时时准备给天子以提醒。他在朝堂上站位于天子背后。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是史佚。如此，我们所见到的就是这样的情景，成王站在中间听百官朝见奏事，担任道、充、弼、承职务的周公、太公、召公、史佚四位德高望众的贤臣立于四周共同辅佐。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就可以做到考虑事情不会失于计划而不周全，做起事来也就不会发生过错了。

成王于是作《颂》，对群臣对他的敬重作答，说：『我这个人并不聪明，你们那么敬重我，我不敢当。我要向有光明道德的人当中的更光明者（即贤中之贤）学习，日积月累，渐渐取得治理国家的经验。愿辅政诸贤，把作君王的最高尚的德行指示给我。』

召公作《召诰》告诫成王说：『您接受上天授命即位天子治理国家，这对于您来说既是件无比美好的事，同时也意味着有无穷多的事需要您去操心。呜呼，既然有非常多的事要思考处理，那又怎么敢不尽心尽力呢！』

又劝成王说：『您应当尽快施行您的德政。您可以把古先氏夏朝的国君看做效法和戒鉴的榜样。夏禹能行德政，所以天道从他统治时社会安定。天既能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地爱禹，那禹也就能面考天心而顺天意行事。时至今日，我们当然知道夏朝的王命早已终结，但那是夏桀抛弃了禹的为政之道的缘故。

『再看商朝，把商朝的国君也来作为法戒。成汤也能法古而敬行德政，天下因他的治理同样安安稳稳。天道之所以使成汤在位时社会保持安定，也是因为成汤能面考天心并顺其行事。如今商朝的国祚已被周所取代，显然那是商纣王放弃成汤德政之道而为政暴虐的结果。

『如今成王您以少年嗣位执政，应当以夏、商两代为戒，不要遗弃上了年纪的人，宜采用老年人的意见，法古人之道来治理国家。身为年轻的国王，能考行古人之德这就已经是很好的了，更何况能考行所谋以顺行天道，那不是达到了「至善」的境界了』。

《召诰》中还说：『我周王朝实行统治要进行政治谋划，不可不借鉴于夏，也不可不借鉴于商。』

周公作《洛诰》，成王恭恭敬敬地向周公施礼，请求给予教诲。周公叮咛成王道：『年轻人对宗派活动要慎之又慎，最好能禁绝此类事情。从今往后，不要让朋党活动再有出现，不要让朋党活动像火一样，刚开始着的时候火焰还很微弱，时间长了，一旦火势大了，就将越来越炽热灼人，不容易扑灭它了。所以说，凡坏事都是从微小的逐渐变大的，要避免造成损害，要在这种事刚出现苗头时就去制止。我为政常

常苦于没有闲暇顾及更多的事情，你是年轻人，应当分取我没有顾及到的事情去做。又听我教你辅民之常法你好照着做。你如果不勉力为政，那你的统治肯定长久不了。』

又作《无逸》。周公在文中对成王劝诫道：『呜呼。君子之所以不贪图安逸享乐，是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已经懂得农民春种秋收进行生产劳动的艰难。而通过贪图安乐的小人的行为，我们也能知道他们这样做靠的是什么。我们来看那些小人中的不孝者。他们的父母辛辛苦苦地种庄稼，而作为儿子他们却不知道种田的艰难，只是一味地游玩，好像供养他们的财富不是父辈们劳动换来而是天生就有的。这种小人粗野不恭，玩够了就欺骗父母，就是不欺骗，也常常侮慢他们的父母，说父母是「古老之人，孤陋寡闻，少见多怪。」』

周公又叹道：『呜呼！继此后世自今以后嗣位之王，都不可过分沉溺于观赏歌舞，安闲舒适，以及游玩田猎。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是因为天下百姓都要听帝王的教命，所以君王应当正己之身以供百姓瞻仰；一定要日夜恪勤政治，不敢自我松懈地说：「今日先玩乐玩乐，明天就不玩了」。这是贪图玩乐的人的做法，不是百姓所希望看到的榜样。也不是天意所愿而敬顺的帝王的形象。要是这样去做，那就是犯了大的过失了。因此成王您应当自勉，勤于政事，不要像商纣王那样被人迷乱，不理国政，终日酗酒为乐，把吃喝当成正事，终至亡国。」

周公又感叹道：『我听别人说，古时的君臣，尽管已是君明臣良，仍然崇尚以善道相互训诫，以美政相安顺，以义方相教诲。君臣相互监督又端正彼此的行为，做到这种地步，所以当时的百姓都顺从教化，没有相互诳欺为幻惑的人。』

周公更感叹道：『呜呼，自殷王中宗，到高宗，到祖甲，直到我朝之周文王，这四位君王都奉行明智之

德以统治人民。就是有人报告他们，说有小人怨恨你们，辱骂你们，这几位明君听到这样的话，认为是自己做得不够，因而更加敬德益民，增修善政。治下的百姓有过失，他们都说是自己的过失。对于百姓怨恨侮骂，他们不仅不敢含怒去治这些人的罪，反而在顾意更多地听到意见以便据之改进自身。』

周公又作《立政》一篇，文中这样写道：『我敢拜手稽首行礼致敬而后告诉您这位嗣世天子：如今您已经正式继承大统成为国王了。我在此将国王立政所用的事都教给您：王之亲近左右常所掌事的是三公，常所委任的是六卿，平法的人叫狱官，缀衣的人称为掌衣服者，而虎贲则是凭借武力来为王效力的人。这些人近王左右，任用最须得人。』讲到这里周公叹道：『呜呼，美哉！这五等官员是立政之本，但懂得对于这些职官的任用必须慎选贤能的君王并不多。』

周公又感叹道：『呜呼，小孩子作了国王了。从今以后，我王对于参与决策的大臣，处理事务的小臣，以及平法之人和养民之夫等等所有诸朝臣，都要灼然能察，知道哪位是称职的人选，便可放开手脚予以任用，要他大胆去治理。用这样的贤臣治理我周王朝的百姓，和平狱讼及种种应当谨慎对待的事。如果真正达到这样的效果，就不要再用别人去取代他们。

呜呼！我周公旦所受贤圣如禹汤等的治国法宝已经都告诉年幼的成王了。从今以后，后世之王立行善政，必须常得贤人，不可任不其才（不可任用没有职务所需才能的人）。』

成王作《周官》，专讲周王朝设官分职用人之法，用以训诫百官。书中讲道：『学好（熟悉）历史，才好做官。凡议时政，要参考先朝制度，如此政治才不致迷乱出错。你们为官断事，应当把先古圣明君臣处理同类事务常用的成功经验作为效法的样板，不要凭仗能言善辩去干扰官员们正常行使他的职权。』还讲道：『人如果不学习，就好比整天对着墙站在那里，他的眼界必然狭窄，知识肯定匮乏。这种人遇事只

会烦恼，不知如何处置，不可能干练。因此，我要告诫所有的官员：崇高功绩的建立，靠的是远大的志向；从容应付各种事务的才能的具备，靠的是勤奋和学习。』又进一步讲道：『做官处事，正直道德，不谋私利，必胸怀坦荡，无所顾忌，这样就容易取得成功从而获得荣誉和美名。倘若虚伪枉道，整日钻营，以求升迁，必然于心劳苦且越来越感到难以处事。』

臣范祖禹说：夏为天子而有天下，传位十七世，享国四百三十二年；商为天子而有天下，传位三十一世，享国六百二十九年；周为天子而有天下，传位三十六世，享国八百六十七年，三代共一千九百二十八年。而这些国君中的好学而见于经传中记载的，仅仅有夏禹、商汤、高宗、周文王、武王、成王五人而已，可以说是极少了。像夏代的启和少康，商代的祖甲、中宗、祖乙、盘庚，周代的康王、宣王等君王，都有丰功伟绩记载在《诗》、《书》等经典中，但这些功绩不属治学的范围，因此也选在这本书当中。综观历史，虽然因为记载或缺或略，致使许多故事因时间久远而难以把它的来龙去脉搞得很清楚。但如果概括地讲，确实是圣明君王少而庸碌之辈多，所以太平盛世短而灾荒战乱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如果他不学习就不能传名于后世。作帝王的看到这种前车之鉴，难道不应当更勤奋地学习吗？像夏代的桀，商代的纣，他们作国君时，政治昏暗、混乱，百姓怨声载道，以至于国家灭亡祖宗也断了香火，后世人们在谈到邪恶的人时首先就想到他们。难道说夏桀、商纣的本性就不会做好事吗？当然不是。是因为他们不效法先王的德政，不亲近任用贤能之士，不进行学习的结果。《书经》里这样说道：『圣明的君王没有想着要作狂妄君王的，而狂妄的君王却总想着有机会能装模作样地当做圣人。』由此可见，君王的圣明与狂妄，它的区别只在想与不想这一点上。这样的结论，难道作君王的人不应当把自己的念头把握好，防止它转到坏的方面去吗？

汉太祖高皇帝

【原文】

汉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时时前称说《诗》《书》。帝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向使秦已并天下，修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右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

【译文】

汉太祖高皇帝刘邦取得楚汉相争的胜利，建立汉王朝政权最初的日子里，太中大夫陆贾常常进宫来给他讲《诗经》、《尚书》。刘邦说：『（我这汉家天下）是靠武力得来的，哪里还需要读什么《诗经》、《尚书》？』陆贾回答说：『（你的天下固然是）靠武力战胜项羽得到的。但是，把汉王朝这个国家治理好，能只靠武力吗？只有文武并用，才是统治国家的长久之术（才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策略）。（你想想）假如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建立秦王朝政权以后，实行『仁义』政策，学习先古圣明君王如尧舜、商汤、周文王、武王的制度法令来治理国家，陛下您难道还会有作皇帝的机会吗？』刘邦听后面有惭愧之色，对陆贾说：『那就请你为我编写一本书，专讲秦朝为什么失去天下而我刘邦又为什么能取得天下；并且把自古以来历朝历代君王取得政权使国家兴盛和失去政权使国家灭亡的经验和教训也都讲清楚。』

陆贾于是按刘邦的意思写了十二篇历代兴亡的故事。每写完一篇进呈给皇帝，刘邦读后没有不称赞说写得好的，他左右近臣听到皇帝说好，也都山呼万岁，于是刘邦把陆贾写的这部书定名为《新语》。

汉太宗孝文皇帝

【原文】

太宗孝文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闻济南伏生治之（生名胜，故为秦博士），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

太中大夫贾谊为长沙王太傅岁余，帝思谊，征之入见。上方受厘，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谊上书言三代之君教太子之法曰：『太子少长则入于学。学者，所学之官也（官谓官舍）。《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思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法也；匡，正也），则德知长而治道得矣。』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

【译文】

汉太宗孝文皇帝刘恒在位时，想找一个对《尚书》素有研究，能够为自己讲解《尚书》的微言大义的人，但在全国各地找了很长时间都没能找到。后来他听说济南有个叫伏生的学者有这方面的才能，便准备把伏生召进宫来。当时伏生年纪已经九十多岁了，人老体弱，不能离家远行。于是刘恒命令太常使掌故晁错前往济南，向伏生学习《尚书》。

太中大夫贾谊出朝任长沙王太傅已有一年多了，文帝很想念他，便下诏征召他入朝觐见。贾谊奉命到来时，文帝刚刚接受了一批郡国祭祀天地后进贡的物品，正在未央宫宣室殿中休息。因为正好碰到

『受厘』，文帝想到鬼神的事很有感慨，便向贾谊询问鬼神到底是怎么回事，贾谊把鬼神是怎样一种东西以及人们为什么祭祀鬼神详详细细地对文帝作了解释。两人谈到半夜，文帝将座席向前移了移后，说：『我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贾生你了，自以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学习在学问上要超过你了，谁知今天与你见了面，才感到还是不如你啊！』

贾谊上书给文帝，谈到夏、商、周三代国君教育太子的方法，说：『太子年龄稍大点就叫他入学。所谓学，指的是学习的官舍。《学礼》中讲：『君王进入东学学习，东学崇尚亲情而以仁慈的品德为贵；通过在东学学习就能够学会处世中对于血缘亲近的人和血缘疏远的人在观念上建立有先有后的次序，从而在考虑问题时也有个先后。君王进入南学学习，南学崇尚年龄而以信义为贵；在这里学习能懂得在处理事务时对于年龄不同的人应当有差别，这样百姓就会信服你而不说你的坏话。君王入西学学习，西学崇尚贤能而以行为道德为贵；通过西学的学习，君王智慧更加提高，在治理国家时能力更强，当然也就会有更大的功绩了。君王入北学学习，北学崇尚地位而以爵位高为尊；君王经此学习，就可以懂得人的贵贱是有等级区别的，也就会懂得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对待什么样地位的人应当有什么样的态度，而不至于做出不恰当的事来。君王入太学学习，在太学中跟着老师学习各种知识，学习之后回到自己宫中还要对学到的知识进行温习，并且要接受太傅的考核；太傅在考核中对于君主所学知识中不准确的要帮助君王准确掌握，对于学习中没有弄懂或理解有误的地方要进行纠正。通过在太学的学习，君王的德性和知识都会有相当的长进而对于治理国家的方法也都能掌握了。以上讲到的这五种学问，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帝王要是都学成并在政治中实施，那么在他治下的黎民百姓也就会受到这种贤明政治气氛的熏陶而使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

汉世宗孝武皇帝

【原文】

世宗孝武皇帝时，倪宽见帝，语经学。帝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又诏求能为韩婴诗者，征蔡义待诏。久不进见，义上疏曰：『臣山东草莱之人，行能无所比，容貌不及众。然而不弃人伦者，窃以闻道于先师，自托于经术也。愿赐清闲之燕，得尽精思于前。』上召见义说《诗》，甚悦之，擢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制曰：『道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于是建藏书之策（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董仲舒对册，推明孔氏，帝遂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建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译文】

汉世宗孝武皇帝刘彻在位时。一日，倪宽进见，与武帝谈起了经学。武帝说：『我起初以为《尚书》是质朴的学问，并不喜欢读它。到后来听倪宽讲说以后，才知道此书很值得一读。』于是便跟着倪宽读了一篇。

武帝又下诏征求能讲解《韩婴诗》的学者，征寻到一位名叫蔡义的人，让他等待皇帝召见。等了很久了还不见要他进见的诏命下来，蔡义便上书给武帝，说：『我是山东的一个从未做过官的普通老百姓，行为不能和别人相比，相貌也不如大多数人雄伟。之所以还能被人们所看得起，我认为是因为我从我的老

师那里学到了一些道德思想，并且自己把这些知识运用到了对于经书的研究之中的缘故。我希望皇帝陛下能赐我一个清闲安息的职位，使我能将自己对于经书的精辟的理解全部贡献给陛下。』武帝于是召见了蔡义，令他讲述《诗经》大义，听后非常满意，便提拔蔡义为光禄大夫、给事中。

武帝于是发布命令说：『用礼制来引导人民，用音乐来感化人民，这是保持社会安定必须采用的方法。然而现今正处于社会大动荡后不久，原来维系社会安定的礼乐都已被破坏殆尽。面对这种局面我非常痛心，故决定仔细寻访全国各地有名气的学者，把他们都请到朝廷来做官。现在我命令，凡在朝的掌管礼仪的官员都必须勤于学习，钻研经术以广博见闻，在推举民间贤德人士为朝廷所用，在振兴衰落的礼乐制度方面为全国人民做出表率；太常议、博士弟子等官员，也要努力对人民实施教化，以使民间礼坏乐崩的风气彻底转变，为贤德人才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于是在宫中修建收藏图书的房屋，在朝中设置专职撰写图书的官职，上自经典，下至诸子百家的学术著作，都收藏于秘府之中。董仲舒在对册时，建议尊崇孔子学说，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遂即废除诸子百家学说，宣扬孔子编订的六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访求，让各地荐举才智出众的人，给这些人授以功名使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又建立太学，修葺郊记社坛，编制新历法，确定推算节气的标准，校正音乐节律，重新为诗歌谱曲，确定祭祀百神的时间和仪式，为周朝的后裔接续传统，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所发出的号令文章，一派光明气氛，令人称道。后世继承帝位的子孙，得以遵循武帝开创的宏伟事业治理国家，使得汉王朝政治开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其风尚可以与尧舜禹三代相媲美。

汉世祖光武皇帝

【原文】

世祖光武皇帝爱好经术，未及下车，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遗。先是，四方学士多逋逃林薮，至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乃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太常差次总领焉。

建武五年，修起太学，备笾豆干戚之容。帝受《尚书》，通大义，召桓荣入说，甚善之。每朝会，辄令荣敷奏经义，帝称善曰：『得生几晚！』拜荣为博士。车驾幸太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每旦视朝，日昃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

【译文】

汉光武帝刘秀爱好读经书钻研经学。每次到一地，往往还未等到安顿下来，便向当地官员寻问精通经学的儒生雅士。通过接见那些儒学大家，与他们共同研读经书讨论经义，借以发现经书的不同抄本，从中寻找自己所读经书中缺短的文字，补充自己的书中不连贯的地方。

在此之前，由于西汉末年及王莽篡政期间的战乱，各地的博学之士大多避乱逃至山林隐居。到了这时，见战乱已平，天下恢复安定，又听说光武帝重视学术和儒生，便都带着自己的藏书和著述，纷纷聚集到京师洛阳。光武帝见此情景大喜过望，下令设置五经博士职官来安置这些学者，让他们各自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教授弟子，命令专管礼乐事务的太常来作博士官的首长。

建武五年（公元二九年），太学修建完毕，学中设置了备有笾豆干戚等礼器可以举行祭祀儒学先师孔

子以及举行乐舞表演的专门场所。

光武帝请学者给他教授《尚书》，以便通晓书中所阐述的道理。他召桓荣入宫为自己讲读，认为桓荣讲得好，所以每到朝会的日子，都要让桓荣上朝为君臣宣讲经书大义。光武帝常常夸奖桓荣，感叹说：『我得到你这样博学的人太晚了！』遂授桓荣以经学博士的职位。

光武帝每次到太学视察，都要把任职于学中的博士们召集到自己面前来讨论经书中的疑难问题。

自从平定了陇蜀等西部地区的战乱之后，国家政治中再没有提到军事、战争一类的事情。皇太子（刘庄）曾经向光武帝问起攻战方面的事情，光武帝回答道：『经书上有记载：古时候，孔子到卫国，卫灵公向他询问战阵的事情，孔子不作回答。这种事情不是你作太子的应当知道的。』

光武帝每次临朝视事，都要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才退朝；而且在散朝后还经常把公卿郎将等官员留在宫中，与他们讲论经书理义，直到半夜时分才睡觉。皇太子见光武帝如此地勤劳而不肯休息，便找了个机会劝道：『陛下，您这么辛苦，虽说具备了夏禹、商汤等先古圣贤君王精明的治国之术，但却丧失了黄帝、老子等道家所提倡的修身养性的安逸舒适的生活情趣。我希望您爱惜自己的身体和精力，寻求一种优哉游哉的安乐宁静的生活方式吧。』光武帝答道：『你不必为我担心。我喜欢这样过日子，不嫌累。』

汉显宗孝明皇帝

【原文】

显宗孝明皇帝为太子时，桓荣以少傅授《尚书》，包咸以郎中授《论语》。及即位，尊荣以师礼，拜为太常。帝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杖，会百官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以下及荣门生数百人。帝自执业，每言辄曰：『太师在是。』

永平二年，三雍初成，以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养老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荣疾笃，帝问之，入街下车，拥经而前，抚荣垂涕，赐以床茵帷帐、刀剑衣被。荣卒，帝变服临丧送葬。

五年，以包咸为大鸿胪，每进见，锡以几杖，入屏不趋，赞事不名。经传有疑，辄遣小黄门就舍即问。

九年，为四姓小侯立学，置五经师，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呼，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译文】

显宗孝明皇帝刘庄为太子的时候，桓荣任职少傅，作为他的老师为他讲授《尚书》；包咸任职郎中，作为他的另一位老师为他讲授《论语》。待到刘庄即位为帝，仍以对待老师的礼节尊敬桓荣，任命他为掌管礼乐祭祀等事务的太常卿。明帝曾经到太常府视察，他让桓荣坐在东侧，在桓荣跟前摆放了小桌子和手杖，以便桓荣靠坐和扶持走动。安置好自己的老师后，明帝又将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以下百官以及桓荣的学生等共数百人召集来接见，并手执经书亲自讲诵。每讲一句，都要谦逊地请教桓荣说：『您在这儿，如有不妥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永平二年（公元五九年），辟雍、明堂、灵台三雍刚刚建成。明帝尊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在新落成的明堂举行养老典礼。礼毕，明帝来到辟雍，就正坐自讲经义，太学中的经学博士们各自手执经书站在明帝面前，寻章摘句，进行考问。皇帝公开接受学者的考试，真是天下奇观，一时间京城中的士族官吏闻风而至，聚集在辟雍通往东南西北四学桥门周围的观看和聆听的人多得难以计数。

桓荣患病，病势沉重，明帝前往探视。来到桓荣住所，刚入街明帝便从车上下来，怀抱着经书疾步前行，到桓荣床边，抚摸着桓荣的病体，伤心落泪，将随行带来的床褥帷帐、刀剑衣被等物交给桓荣的家人以供随时使用。桓荣去世后，明帝改换服饰亲自上门吊唁并为其送葬。

永平五年（公元六二年），任命包咸为大鸿胪。每次包咸入宫进见，明帝都要命人拿来几杖供包咸靠扶；包咸入宫，明帝都要关照他不要着急，慢些走，包咸有事要讲，明帝也总是要他免去君臣间的繁薅礼节，直截了当地说就可以了。明帝在宫中读书，对于经传中的文句遇有疑问，便派遣小宦官到包咸家里去请教。

永平九年（公元六六年），明帝下令为樊、郭、阴、马四姓外戚家的子弟专门设立学馆，安排五经学师，要他们入馆读书；同时命令皇宫中的侍卫军士们也都必须参加学习《孝经》，通晓经文章句所说的深刻道理。处于西北部的匈奴人听说明帝如此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国民的教育，也把自己的子弟送到洛阳来学习。这样，一种声势大、形式好的学习气氛，在永平年间兴盛起来了。

汉肃宗孝章皇帝

【原文】

肃宗孝章皇帝为太子时，张酺侍讲，及即位，出为东郡太守。元和二年，东巡狩幸东郡，引酺及门生并郡县掾史会庭中。帝先备弟子之仪，使酺讲《尚书》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礼。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兰台令孔僖因自陈谢，帝曰：『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敢所承。』帝大笑曰：

『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帝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四年，会诸儒于北宫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石渠故事。

【译文】

东汉肃宗孝章皇帝刘炟作太子的时候，张酺是他的侍讲老师。刘炟即位后，张酺出朝改任东郡太守。

元和二年（公元八五年），章帝东巡，来到东郡视察，召集张酺和他的门生以及东郡及属县的部属官吏太守官署中会面。章帝先按照学生拜见老师的仪式，请张酺讲了《尚书》中的一篇文章，然后才还坐与张酺行君臣之礼。

东巡结束，还朝时路过山东故鲁国地面，章帝一行又来到阙里。在这里章帝先以三牲全备的最高规格的太牢祭祀了孔子及其弟子七十二贤人；又命乐工演奏黄帝、唐、虞、夏、商、周六代的古典乐曲，在一般圣乐缭绕的气氛中大会孔子家族中男子年龄在二十岁以上的共六十三人，并命其中的儒学之士讲论经义。兰台令史孔僖因见章帝对儒学这么重视，对孔子的后裔这么礼待，非常激动，连连向章帝表示感谢。章帝说：『今天的盛会，对于你的祖先是不是很有光荣啊？』孔僖答道：『我听说，自古以来，圣明的君王没有不尊师贵道的。今天陛下以皇帝万乘之尊的身份，屈尊来到我的故乡，这件事表明了陛下您尊崇礼待先师孔子，实在为您的圣德增辉不少！至于讲到光荣我的祖先，那我可承受不起您这么大的礼遇噢！』章帝大笑，说：『讲得好！讲得好！如果不是圣人的子孙，怎么能讲出这么高水平的话呢？』于是便提升孔僖为郎中。

章帝倾心于儒术，特别好读《古文尚书》和《春秋左氏传》。建初四年（公元七九年），他与朝中诸儒学大师会聚于北宫白虎观，共同探讨『五经』各种学派的异同。让五官中郎将魏应以皇帝的名义提问，由侍中淳于恭将众人的答辩向他奏报，然后章帝亲自对诸多的意见进行裁决，以决定经文的标准疏解，就像当年宣帝在石渠阁所做的一样。

后魏高祖孝文皇帝

【原文】

后魏高祖孝文皇帝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史传百家，无不该涉。亲讲《丧服》于清徽堂，从容谓群臣曰：『彦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缨绂，失过庭之训，并未习《礼》，每欲令我一解《丧服》。自审义解浮疏，抑而不许。顷因酒坐，脱尔言从，故屈朝彦，遂亲传说。将临讲坐，惭战交情。』御史中丞李彪对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讲《礼》。陛下圣睿渊明，事超百代。臣得承音旨，千载一时。』

【译文】

后魏高祖孝文皇帝元宏爱好读书，手中很少有不拿着书读的时候。对于五部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一般人都认为文字晦涩难明，而孝文帝却对这些经书烂熟于胸，随便翻开哪一部，都能立即把任何一段文字解释得清清楚楚；对于正史、传记以及各种学术流派的著作，他没有不了解的。

有一次，孝文帝来到清徽堂亲自讲读《礼记·丧服》。开讲前，他从容对前来听讲的群臣说：『彦和、季豫等人年龄很小便做了官，失去了在家中接受父亲教育的机会，也没有读过《礼记》。他们总

是想着让我给他们讲一讲《丧服》这一篇。我因为觉得自己对这篇经文理解得还很肤浅，所以一直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刚才因为坐在一起吃酒闲谈，不小心说走了嘴，随口答应了人家。既然答应了，便不可失信，所以只好委屈诸位朝臣给个面子，听我讲讲《丧服》这篇文章了。现在大家都来了，马上就要开讲，我这心里呀，老是感到自己学识不高，给大家讲经似乎胜任不了，所以是既惭愧又有点儿害怕。』御史中丞李彪回答道：『陛下，您不必如此（话不能这样说）。从古到今，没有听说过皇帝亲自为朝臣讲解《礼记》的事情。陛下您知识渊博，思想开明，能做出这样的事，那已经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明君圣主。为臣的我，能亲耳聆听皇帝讲经，那真是千年一遇的难得的机会啊！』

唐太宗皇帝

【原文】

唐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初为天策上将，开天策府，置官属，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谘议典签苏勖；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帝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而寝。又使库直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洲。

武德九年，帝即位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取三品已上子孙，充弘文馆学生。

贞观二年正月，帝著《金镜述》以示侍臣，其略曰：『乱未尝不任不肖，治未尝不任忠贤。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则受天下之祸。』

十四年二月，幸国子监观释菜，命祭酒孔颖达讲《孝经》，赐祭酒以下至诸生高第帛有差。是时，帝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教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学生能用一大经已上，皆得补官。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三千二百六十员。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能通经者，听得贡举。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帝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疏，谓之《正义》，令学者习之。

二十二年，帝撰《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曰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

【译文】

唐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李世民，在大唐王朝开国之初被任命为天策上将，开辟了天策将军府署，并配备齐了署中大小官员。之后，他便在皇宫西侧开设了一个学馆，延请四方的一些有名气的文学大家在馆中任教。让秦王府属官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谘议典签苏勖，以及天策上将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人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等人，全都在他们担任原来职务的同时兼任文学馆学士；把他们分成三班，按不同的日期排开轮流在馆中日夜值班，供给他们精美的食物，对他们待遇优厚、尊如宾客。太宗每次入朝谒见高祖，在处理完公事之后，总要抽时空到馆中来，把诸位学士召集到一起讨论文章典籍方面的问题，经常要到半夜才休息。

他还命令当时最有名的画家、库直阁立本为这些人画了像，又让褚亮写了赞颂的文章，给这十八个人冠以『十八学士』的名号。士大夫当中被选入『十八学士图』中的人，被人们称作『登瀛洲』，意思是像成了神仙一般地令人向往。

武德九年（六二六年），唐太宗即帝位于弘文殿，随即命人搜集了经史子集四部各类图书二十余万卷收藏于殿中，并在殿侧设置了弘文馆，精选全国最著名的文学大师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人，让他们以本官兼弘文馆学士，命令他们轮流在弘文馆中值夜班。太宗在临朝处理政事之余，便把这些学士们叫到内殿，和他们一起讨论自己作为皇帝在说过和做过的事情中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同时也一起研究当前和日后政事上的措施。这样的时事讨论也往往要延续到半夜才结束。太宗又下令将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都送入弘文馆中去作学生。

贞观二年（六二八年）正月，太宗撰成《金镜述》并把它拿给侍臣们读。书的大意是：国家政治的混乱，是君王任用品行不好的人的结果；国家政治安定，是君王任用正直贤明的人的结果，作为帝王，能任用忠贤治理国家，那他就能享天下之福；如果不任忠贤而任用不肖之人，那他只好去承受天下之祸去了。

贞观十四年（六四〇年）二月，太宗来到国子监观看监中举行释菜典礼，并命令国子祭酒孔颖达解读《孝经》，完毕后，赏赐祭酒以下所有国子监官员及学生中的成绩优秀者锦帛多少不等。当时太宗大量征求全国各地有名的学者充任学官，让他们到国子监去讲学；而国子监学生当中，凡能熟练掌握一种经书以上者都可以授予官职。同时，又命令增筑教室一千二百间，增招学生至满三千二百六十名。不仅如此，还为军队，无论是有固定驻防营地的还是转战南北的，都配备了经学博士，以为将士

讲授经书；如果军队中的官兵有能通晓经义的，任由他们去参加科举考试，以求功名。

这种尊师重教、提倡学习的政策推行开来，一时间全国各地的学者纷纷汇集到京师长安。以至于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附属国的首领，也都把他们的子弟送到长安，请求进国子监学习。而在国子监中登堂为学生授课的学官学者，竟达八千余人之巨。老师学生都多起来了，学习的风气也兴起来了，唐太宗又进一步考虑到老师多学派也多，经书章句繁杂，很难有统一的理解和传授。于是使命孔颖达与诸位儒学大师撰著五经书的定本，定名为《五经正义》，作为儒学的统一教材，让学生去学习。

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年），太宗撰成《帝范》十二篇，把他赐给太子李治，让他学习。《帝范》十二篇的题目分别是《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并且嘱咐太子李治说：『修养个人德行和治理国家的学问，全都在这本书当中了。如果哪一天我死去，那我也就没有更多的话要对你讲了。』

唐玄宗皇帝

【原文】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为太子时，褚无量以国子祭酒侍讲，及即位，加右散骑常侍。开元三年，帝谓宰相曰：『朕每读书，有所疑滞，无从质问。可选儒学之士，使入内侍读。』卢怀慎荐太常卿马怀素，乃以怀素为左散骑常侍，与无量更日侍读。每至阁门，令乘肩舆以进；或在别馆道远，听于宫中乘马，亲送迎之，待以师傅之礼。以无量羸老，特为之造腰舆，在内殿令内侍舁之。

五年，怀素为秘书监，奏省中书散乱讹缺，请选学术之士二十人整比校补。从之。于是搜访逸

书，选吏缮写，命国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韦述等二十人同刊正，以褚无量为之使，于乾元殿前编校群书。八年，无量卒命右散骑常侍元行冲整比群书。行冲上《群书四录》，凡书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

十一年，置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秘书监徐坚、太常博士贺知章、监察御史赵冬曦等，或修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修书使总之，有司供给优厚。中书舍人陆坚以为此属无益，于国徒为糜费，欲悉奏罢之。张说曰：『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帝闻之，重说而薄坚。

十三年，帝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集仙殿，帝曰：『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贤者，济理之具，朕今与卿曹合宴，宜更名集贤殿。』其书院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以张说为知院事，右散骑常侍徐坚副之。

二十五年，帝制《训诫》六篇以示诸王，其旨盖明君臣父子之义、斋祭稼穑之事。宰臣李林甫等宣布中外，手诏曰：『周公诫伯禽无以鲁国骄人。朕万圣虽惭，岂忘诫子。聊示庭训，何足宣布也。』

天宝二载，帝自注《孝经》，颁于天下。

【译文】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李隆基为太子时，褚无量以国子祭酒的职务作他的侍讲官；玄宗即位，给褚无量加授右散骑常侍。

开元三年（七一五年），玄宗对宰相说：『我每当读书遇到疑难问题或读不通时，总是没有人可以去问。你可以给我去挑选些在儒学方面极有学识的人来，让他们到宫内侍读。』于是卢怀慎便向玄

宗举荐了太常卿马怀素，玄宗任命马怀素为左散骑常侍，让他与褚无量两人隔日轮流入宫侍读。褚无量、马怀素两人进宫侍读时，每次到了玄宗读书的阁门前，玄宗都传令要他们乘轿进来，不必行走；有时玄宗在其他馆中读书，离宫门较远。就传令可以任由他们两人在宫中乘马，并且还亲自迎送两人，用对待师傅的礼节对待他们。因为看到褚无量年老身体瘦弱，玄宗又特别命人为他作了一抬腰舆（便轿），在内殿中让内侍宦官抬着他走动。

开元五年（七一七年），马怀素任秘书监，奏称秘书省中所藏图书散乱讹缺，请玄宗批准选派二十位学者入监中进行整理编次，校刊补遗。玄宗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便动手安排人搜求访问散逸于民间的图书，选派吏员进行抄写，并命令国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县尉韦述等二十人共同进行文字订正，让褚无量作为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在乾元殿前开始编排校定所有的藏书。开元八年，褚无量去世，又命令右散骑常侍元行冲接替褚的职务继续整理群书。不久，元行冲整理完毕，奏上所编的《群书四录》，书中著录了图书共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

开元十一年（七二三年），设立丽正书院，以召集文学精英，秘书监徐坚、太常博士贺之章、监察御史赵冬曦等人，或者担任修书，或者担任侍讲教官，命宰相张说任修书使总管书院事务，朝廷各有关部门保证给书院优厚供给。中书舍人陆坚认为这样做属于没有什么益处的事情，对于国家来说纯粹是浪费钱财，就打算向玄宗上书，把这项工作全部停止下来。张说向陆坚解释道：『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国家安定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哪一个不是大兴土木建造宫室，哪一个不是四方追求美女以悦耳目？如今当朝皇帝不去搞那一套，却单单要征求和礼待文人学者，发扬图书典籍事业，这样做获得的利益大，而损失的财物则很少很少。陆先生您所说的话，为什么讲到这些呢？』玄宗听到这样的事

情，心中很有感触，从内心里就器重张说而有些对陆坚不满意了。

开元十三年（七二五年），玄宗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等官员宴会于集仙殿，玄宗讲到集仙殿的名称，说：『神仙，是一种虚幻飘渺的说法，我不太赞成这种理论；而贤呢，却是扶助理性的一种工具。我今天与朝廷各机关的主要官员在这里合宴，众位都称得上是贤人，就把集仙殿改名为集贤殿吧！至于丽正书院的官员，凡五品以上的授为学士，六品以下的授为直学士；让张说担任知院事，让右散骑常侍徐坚作他的副手。』

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年），玄宗撰成《训诫》六篇，送给诸王。《训诫》的中心思想在于说明君臣、父子之间的责任和义务，他们应当如何相处，以及祭祀活动的礼仪，种植收获等农事劳动。宰相李林甫等请玄宗将此书宣布朝廷内外，玄宗亲自写手诏说：『周公告诫他的儿子伯禽不要以自己是鲁国这样的大国的国君而傲慢地对待别人。我与圣人比较起来虽不如，但我怎么敢忘了教育自己的儿子呢！写这本书，不过是要尽我一个父亲教育儿子的责任罢了，哪里谈得上宣布中外。』

天宝二年（七四二年），玄宗亲自为《孝经》作注后，颁行于天下。

唐宪宗皇帝

【原文】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留意坟典，每览前代兴亡得失之事，皆三复其言。又读贞观、开元《实录》，见太宗撰《金镜述》及《帝范》，玄宗撰《开元训诫》，帝遂采《尚书》、《春秋后传》、《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晏子春秋》、《新序》、《说苑》等书君臣行事可为龟镜者，集成十四篇，一曰君臣道合，二曰辨邪正，三曰戒权倖，四曰戒微行，五曰任贤臣，六曰纳忠谏，七曰慎征

伐，八曰慎刑法，九曰去奢泰，十曰崇节俭，十一曰奖忠直，十二曰修德政，十三曰谏畋猎，十四曰录勋贤，分为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迹》。元和四年，以其书写于屏风，列之御座之右。遣中使以书屏六扇至中书，宣示宰臣李藩、裴垍曰：『朕近撰此屏风，常所观览，故以示卿。』藩等上表贺。

【译文】

唐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李纯，对于《三坟》、《五典》这些记载上古历史的书很留意，每当他在读这些书时看到前代帝王兴亡得失的故事时，都要把书上的记载反复地看上三遍。又有时读贞观、开元《实录》，见太宗撰《金镜述》和《帝范》，玄宗撰《开元训诫》，也觉得自己读书也应当有所作为，便摘录《尚书》、《春秋后传》、《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晏子春秋》、《新序》、《说苑》等书当中所记载的君臣所做的事情当中那些可以用来借鉴的内容，汇辑成十四篇，第一篇名为君臣道合，第二篇名为辨邪正，第三篇名为戒权倖，第四为戒徽行，第五为任贤臣，第六为纳忠谏，第七为慎征伐，第八为慎刑法，第九为去奢泰，第十为崇节俭，第十一为奖忠直，第十二为修德政，第十三为谏畋猎。第十四为录勋贤。分为上下卷，命名为《前代君臣事迹》。元和四年（八〇九年），将这部书抄录在屏风上，列在朝堂御座之右；又派宫中的宦官带着书屏到中书省署，向宰相李藩、裴垍宣示，说：『我最近写了这么个屏风，常常自己独自观赏，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们』。李藩等人上表向宪宗表示祝贺。

【原文】

臣祖禹案：欧阳修赞曰：『唐有天下，可称者三君，玄宗、宪宗不克其终；盛哉太宗之烈也！』今臣述明皇、宪宗，取其务学而已。

【译文】

臣范祖禹谨案：欧阳修曾作赞辞说：『唐王朝统治全国期间，他的皇帝当中，可以被人称道的贤明的君王有三位，但是其中两位，玄宗、宪宗都没将圣明君王的治国方略坚持一生，唯有太宗做到了。太宗的伟烈功绩，真可以说是盛大无比啊！』现在我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唐明皇和唐宪宗两位君王，并不是因为他们也创下了什么功绩值得称颂，而是仅仅把他们读书学习的故事写出来作为我们的榜样而已。

宋太祖皇帝

【原文】

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建隆元年正月幸国子监，二月又幸，诏加饰祠宇及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帝亲制文宣王、兖公二赞。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车，而褒先圣之后，封贤臣之墓，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囚，是以天下悦服。传世三十，历祀八百，盖由此也。太祖皇帝承五代之季，受天眷命，皇业初基，日不暇给。而即位之月，首幸国学，谒鸱先圣，次月又幸，尊师重道，如恐不及。儒学复振，实自此始，所以启佑后嗣立太平之基也，与武王未及下车之政，何以异哉？

三年六月，以右谏议大夫崔颂判国子监。始叙生徒讲学，帝遣中使以酒果赐之，因谓侍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帝召宗正丞赵孚对后殿，令讲《周易》，谓左右曰：『孚所说精博，亦可赏也。』

四年四月丁亥，幸国子监。

开宝元年，知制诰李穆荐王昭素，召见便殿。昭素，开封酸枣人。通九经，尤精《诗》、《易》。时年七十七，精爽不衰。帝问何不求仕进致相见之晚，对曰：『臣草野蠢愚，无以裨圣化。』赐坐，令讲《易·乾卦》，召宰臣薛居正等观之，至『飞龙在天』，帝曰：『此书岂可令常人见！』昭素对曰：『此书非圣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访以民间事，昭素所言诚实无隐，帝嘉之。寻以衰老辞，求归乡里，拜国子博士，致仕。留月余遣之。

帝自开宝以后好读书，尝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赵普为相，帝尝劝以读书。

臣祖禹曰：太祖皇帝之时，天下未一，方务战胜而欲尽令武臣读书。夫武臣犹使之读书，而况于文臣其可以不学乎？又言『宰相须用读书人』，夫宰相犹当读书，而况于天子其可以不学乎？又劝赵普以读书，盖太祖皇帝知学之益，又知为君为相不可以不学也。《书》曰：『圣有谟训，明徵定保。』太祖皇帝之训，子孙可不念之哉！

帝因读《尚书》，叹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法网之密邪！』

臣祖禹曰：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指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对应而已。太祖皇帝读书能知其要如此，史臣以为有意于措刑，其可谓至仁矣。

【译文】

宋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建隆元年（九六〇年），宋太祖赵匡胤视察了国子监。二月，又来到国子监视察，命令文庙等建筑进行修饰，对所供奉的先圣（孔子、孟子）、先贤（孔孟弟子中的著名者）以及历代儒学大师的画像重新进行塑造或绘制。并亲自撰写了文宣王孔子

和兖公孟子的两篇赞文。

范祖禹说：当年周武王战胜纣王、攻克商都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褒扬先古圣明君王黄帝、陶唐、帝尧、虞舜、夏禹等的后裔，寻访他们并封给土地；对商纣时贤臣比干的墓地进行修葺；对于商纣时的掌官礼乐的官员中的贤明之士，仍让他们官居原职；并释放了被纣王囚禁的箕子，命他管理商都遗民。这样做，天下臣民百姓都乐于服从他的统治。周王朝能够传位三十世，历时八百年，都是从这时打下的基础。

我宋朝太祖皇帝接承五代的传统，受天命眷顾，即位为帝，创立新朝。在国家刚刚建立，事务极其繁忙的时候，却在即位的当月便首先去国学拜谒孔孟先圣，第二个月又去拜谒，如此的尊师重道，唯恐有什么事情考虑不周全。儒学后来能在宋朝重新振兴，追根溯源，正是由这里开始的。而宋太祖这么做，也就是要通过这些行动来在全国倡导一种读书的气氛，为继位的后世子孙打下个太平之世的基础。这与周武王初到商都的所作所为，又有什么不同呢？

建隆三年（九六二年）六月，任命右谏议大夫崔颂为国子祭酒，掌管国子监事务。国子监开学，叙师生之礼，开始传统授课的时候，太祖又派遣宫中的内臣给国子监送去赏赐的美酒果品，就这件事对身边的侍臣说明自己的意图：『如今的武臣我想让他们都去读书，使他们通过读书来懂得治理国家的方法。』太祖又召宗正寺丞赵孚到后殿应对，命他给自己讲读《周易》，一边听一边对左右侍从说：『赵孚对于经义的阐说，既精深又广博，听起来很有味道。』

建隆四年四月丁亥日，太祖又一一视察了国子监。

开宝元年（九六八年），知制诰李穆举荐王昭素，太祖于便殿召见了昭素。王昭素是开封府酸枣

县（今河南延津县）人。此人博通九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同礼》、《仪礼》、《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对于《毛诗》《周易》尤其具有精深的研究和见解。当时王昭素年纪已有七十七岁，但依然精力充沛，行动爽快；一点儿也不显衰老。太祖问王昭素，为什么不参加科举考试以求做官从政，结果使你我彼此相见这么晚。王昭素回答说：『我是个普通老百姓，既愚又蠢，没有什么学问和本领。陛下如此看重我，我真不知道怎样做才能对陛下有所裨益。』太祖让王昭素坐下来，命他讲解《周易·乾卦》，并把宰相薛居正等人召来看他们君臣讲论。讲到『飞龙在天』一句时，太祖说：『这里不能让普通人看，讲龙的，只能是作真龙天子的皇帝看。』昭素回答说：『没关系。这书里虽这么讲，但如果不是圣人出现，就不能与卦中所说的卦象相合。』于是太祖又向王昭素询问了一些民间的事情，王昭素一一作答，讲的都是老实话，一点儿也不隐瞒。太祖很满意，称赞了他。没过多久，王昭素以年纪衰老为由，向太祖请求回归乡里。太祖答应了他，任命他为国子博士，然后办理退休手续，完毕后又留他在宫中住了一个多月，才放他回乡。

太祖自开宝以后，就十分爱好读书，他曾经感叹地说：『宰相这个职务，一定要用读书人来担任。』赵普当了宰相后，太祖时常劝他读书。

范祖禹论道：太祖皇帝在位的时候，天下还未统一，还要进行战争征伐。在这样的形势下，太祖还考虑到要让所有的武臣都读书学习。既然连武臣都要让他读书，那么对于文臣，他难道可以不学习吗！太祖皇帝还说过：『宰相须用读书人』，身为宰相的人，一般都是博学之士，尽管如此，仍然应当读书；那么对于做皇帝的，难道可以不学习吗？太祖还常常劝赵普读书，那实在是太祖皇帝深知学习的好处，又深深地懂得作君王和作宰相的人是不可以不学习的。《尚书》里讲道：『圣有谟训，明

儆定保（对于先古圣明君王的思想和告诫，只要是看到的定要实行）。』太祖皇帝的教导训诫，他的子孙难道可以不常常记念着吗！

太祖因读《尚书》有感想，而叹道：『尧、舜两圣在位的时代，共工、欢兜、三苗及鲧四个部族首领，尽管罪行严重，对他们的处罚也不过是流放而已。为什么到了近代法网却要那么密，处罚要那么严厉呢？

范祖禹论评说：作为帝王读书，他是要学习尧舜这样的先古圣明君王的治世之道；一定要把尧舜的治道的核心内容学懂弄通，这样就可以按照圣道行事，来治理国家和人民。这样叫做天子的学习。这种学习并不像臣民的那种学习。臣民的学习则是分析经书章句，考证诸本异同，专门进行记忆背诵，以便应付考试中的问对罢了。太祖皇帝在读书学习的时候，能够清楚地懂得读书的要领在这里。史臣们认为，太祖皇帝已经产生了修改国家的刑法，减轻处罚程度的打算了。可以说，太祖皇帝的这种打算，已经是非常的人道了。

宋太宗皇帝

【原文】

太宗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睿烈大明广孝皇帝，太平兴国八年，以听政之暇，日阅经史，求人以备顾问。始用著作佐郎吕文仲为侍读，每出经史，即召文仲读之。帝语宰相曰：史馆所修《太平总类》，自今日进三卷，朕当亲览。』宋琪曰：『陛下好古不倦，观书为乐。然日阅三卷恐至罢倦。』帝曰：『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以为鉴戒，虽未能尽记，其未闻未见之事固多矣。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好学之士，读万卷书亦不为难。大凡读书，须性所好，若其不好，读亦

不入。昨日读书，从己至申，有鹳飞止殿吻，至罢方去。」左右曰：「昔杨震讲学，有鹳衔鳣坠堂下，亦此类也。」

九年，帝谓近臣曰：「朕读书，必求微旨。《尚书》云：「伊尹放太甲于桐宫，三年，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作书三篇以训太甲。」伊尹忠于太甲，其理明矣。杜预《春秋后序》云：「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立其子陟。」又《左氏传》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然则太甲虽见放还，杀伊尹，犹以其子为相。此与《尚书》叙太甲事异，不知伏生昏忘，将此古书乃当时杂记，未足审也。岂有杀其父而复相其子者乎？且伊尹著书训君，具在方册，必无自立之意。杜预通博，不当凭汲冢杂说特立疑义，使伊尹忠节惑于后人。」

端拱元年八月，幸国子监，谒文宣王毕，升辇将出西门，顾见讲坐左右言学官李觉方叙徒讲书，即召觉令对御讲说。觉曰：「陛下六飞在御，臣何敢辄升高坐？」帝为降辇，令有司张帟幕设别坐，诏觉讲《易》之泰卦，从臣皆列坐，觉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应之旨。帝甚悦，赐帛百匹。明日，谓宰臣曰：「昨听说泰卦，文理深奥，足为君臣鉴戒。朕与卿等当遵守勿怠。」

淳化五年十一月，幸国子监，召直讲孙奭讲《尚书》，判监李至执经讲《尧典》。一篇未毕，遽令讲《说命》三篇。帝曰：「《尚书》主言治世之道，《说命》居最。文王得太公，高宗得傅说，皆贤相也。」复诵《说命》『事不师古，匪说攸闻』二句，曰：「诚哉是言。何高宗之时而有贤相如此？」嘉叹久之。

帝与近臣论三史曰：「夫史书之作，务在惩恶劝善。若采摭小说异闻以缀饰者，盖不足训。大约忠孝正直可为嘉叹也。」

【译文】

太宗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睿烈大明广孝皇帝

太平兴国八年（九八三年），宋太宗赵光义在听取群臣奏报，处理诸多政务的空闲时间，每天都要阅读经书、史书，所以想找个人作他学习的顾问。起初任用著作佐郎吕文仲为自己的侍读官，每当拿出经书史书准备学习时，就把吕文仲召进宫来，让他讲读。太宗对宰相说：『史馆所撰修的《太平总类》一书，从今天起，每天给我送来三卷，我要亲自看看这部书。』宰相宋琪说：『陛下您喜好历史达到了不知疲倦的程度，以读史书作为一种乐趣。尽管这样，如果每天就要看三卷，这么大的阅读量，恐怕要累坏您的身体了。』太宗说：『我天生的就喜欢读书，开卷必然有益。每当我读到前代帝王兴办或废除什么事物，都把它作为我今日行政的借鉴。虽说这些事情不能都记住，但这样的事我所没有听说过和没有见到过的毕竟是太多了。《太平总类》这部书总共有一千卷，我想用一年的时间把它通读一遍。因此我也想到，一个人如果爱好学习，要读一万卷书也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一般来说，读书必须是他本人具有一贯的爱好；假如他不爱好，读书也读不进去。昨天我读书，从上午巳时一直看到下午申时，其间有一只鹳雀飞来落在对面殿脊的吻头上，直到我读完书它才飞走。』太宗左右的侍臣说：『有个故事，讲古时候有位学问家名叫杨震，他在讲学的时候曾经遇到一只鹳雀嘴里叼着一条鳣鱼掉落在书斋的堂下。说的也是这一类的事情。』

太平兴国九年，太宗对侍卫在身边的人说：『我在读书的时候，对于书里所谈到的很微细的意思都要探究个明明白白。比如《尚书》里说「伊尹把太甲流放到桐宫作看守成汤墓地的宫令。三年，身着冠冕礼服，恭恭敬敬地把继承太甲王位的嗣王从亳邑迎接回来，并且作了三篇文章来训诫太甲。」

从这些文字中看来，伊尹效忠于太甲，那道理是非常明显的。杜预所作《春秋后序》里是这样记述的：「伊尹把太甲软禁于桐宫，自己即位为王。七年，太甲从桐宫逃出来，杀了伊尹，立伊尹的儿子陟为主。」而《春秋左氏传》里又是这样说的：「伊尹把太甲（从桐宫里）放出来复位，自己作他的相，并且没有一点怨恨的意思。」从这段文字看，则是说太甲虽然被放了出来并且杀了伊尹，仍然要任用伊尹的儿子为相。这与《尚书》所记载的太甲的故事不同。不知伏生是不是因为老年昏忘，这部古书（汲地出土的《竹书记年》）实际是当年的杂记，没有进行充分的审查核对，当做了经文。哪里有杀了某人的父亲却又任用他的儿子为相的君王？而且伊尹写书劝诫君王的事在当时的史书中都有记功，既然伊尹这么做，那他肯定没有自立为君王的意思。杜预是个博通经史的大学问家，他不应当根据从汲地墓中出土的杂书中的记载对《尚书》提出疑义，结果使伊尹对商王朝的效忠和节义的形象在后人心目中产生疑惑。

端拱元年（九八八年）八月，太宗来到国子监，拜谒文宣王孔夫子典礼完毕后，乘轿准备出西门回宫。转身的时候，正好回头看见讲座左右的言学官李觉才开始与他的学生叙礼准备讲书，太宗便把李觉召到跟前，命他给自己讲说经书。李觉说：『陛下您六飞在御——我怎么敢随便就坐得高高的讲书呢？』太宗于是特意下轿，让随从们铺张铁幕设置别座，命李觉坐下给讲解《易经》里的《泰卦》，随从的官员也都依次坐了下来。李觉于是便讲了一通《周易》里的卦辞卦象，即天地间的感应会在君臣之间有相应的体现等理论。太宗听了很高兴，赏赐给李觉锦帛百匹。第二天，太宗对宰相们说：『昨天李觉讲的《泰卦》，卦辞中的道理很深奥，完全可以作为君王和臣子行为的鉴戒。我与你们各位应当遵守卦辞的说法去做事，不能违犯或懒堕。』

淳化五年（九九四年）十一月，太宗到国子监，召国子监直讲官孙奭讲《尚书》。国子监制监李至手执经书讲说《尧典》，一篇还没有讲完，又令改讲《说命》三篇。太宗说：『《尚书》主要是讲君主治理国家的方法的，其中《说命》一篇是最重要的篇章。周文王得姜太公，商高宗得傅说，两人都是最有才能的王国之相。』接着太宗背诵了《说命》中『作事不效法古人（而能成功），那是我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之句，说道：『这话讲得好啊！怎么商高宗时会有像傅说这么有才能的国相呢？』说完不禁赞叹了许久。

太宗与左右近侍之臣讨论《史记》、《汉书》、《三国志》三部史书的得失。太宗说：『史书的撰著，其根本目的在于惩恶劝善。假如编撰者在写作过程中尽收集些小说，奇闻异事来粉饰太平，那实在没有什么教育人的价值；只有记载忠孝正直的人和事，才是值得人们称颂和赞扬的。』

宋真宗皇帝

【原文】

真宗膺符稽古成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敦尚文雅，自出阁后，专以讲学属词为乐，禁中游息之所，皆贮图籍，置笔砚。及即位，每召诸王府侍讲邢昺、及国子监直讲孙奭等，更侍讲说，质问经义，久而方罢。

咸平元年正月，命择官详正经籍，因访明达经义者。参知正事李至曰：『国学讲书雀颐正，博通诸经，尤善说。』帝曰：『朕宫中无事，甚乐听书。常求其人，尤不易得。』翌日，召颐正讲《尚书》于景福殿，又于苑中讲《大禹谟》。自是，日令赴御书院侍对。帝谓宰相曰：『颐正讲诵有功。卿等更于班行中，择性行淳朴、通经义、知损益者二人，以名闻。』颐正讲《尚书》至十卷，年老步趋艰

蹇，表求致仕。帝命坐，向恤甚至，听以本官致仕，仍充直讲。

二年七月，以兵部侍郎杨徽之、户部侍郎夏侯峤并为翰林侍读学士，国子祭酒邢昺为翰林侍讲学士，翰林侍读吕文仲为翰林侍读学士。按，唐开元之中置侍读，其后有翰林侍读学士。五代以来，四方多事，时君尚武，不暇向学，故此职久废。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观书为乐，殆至宵分，手不释卷。繇是命文仲为翰林侍读，寓直禁中，以备顾问，然名位未崇。帝聪明稽古，奉承先志，首置此职。择耆儒旧德以充其选，班秩次翰林学士，禄赐如之；设直庐于秘阁，侍读更直，侍讲长上，日给尚食珍膳，夜则迭宿。帝尝谓近臣曰：『朕听政之外，未尝虚度时日，探赜编简，素所耽玩。但古圣奥旨有未晓处，不免废忘。昨置侍讲、侍读学士，自今令监馆阁书籍中使，日具当宿官名进入，朕欲召见访问。』自是多召对询访，或至中夕焉。

臣祖禹曰：太宗始命吕文仲侍读，真宗置侍讲、侍读学士，仁宗开迩英、延义二阁，日以讲读为常。累圣相承，有加无损，有勤无怠，此所以遗子孙之法也。是以海内承平百三十年，自三代以来，盖未之有，由祖宗无不好学故也。

二年七月幸国学，谒先师及览《三礼图》，召祭酒邢昺直讲。崔偓佺讲《尚书·大禹谟》，从官侍座。帝曰：『偓佺讲《书》，颇达经义，甚可称也。』赐偓佺绯章服，昺已下器币。

帝御便殿，命翰林侍讲学士邢昺讲《左氏春秋》，侍读预焉。

五年，讲《春秋》毕，邢昺曰：『《春秋》一经，少有人听，多或中辍。』帝曰：『勤学有益，最胜它事。且深资政理，无如经书。朕听政之余，惟文史是乐，讲论经义，以日系时，宁有倦邪！』十月，召近臣观书龙图阁，帝曰：『朕自幼至今读经典，其间有过数四。在东宫时，惟以叙书为念，其

间亡逸者，多方购求，颇有所得。今已类成正本，除三馆、秘阁外，又于后苑、龙图阁各存一本。但恨校对未精，如《青宫要纪》、《继体治民论》，此一书二名，并列篇目，盖购书之初务于数多，不嫌重复，甚无谓也。』

景德四年三月，召近臣观书玉宸殿，即帝偃息之所，茵帏皆黄绢为之，无文采之饰。叙书八千余卷，帝曰：『此惟正经正史累校定者，小说、它书不置于此。盖俯禁中，最便观览。国家搜访图书，其数渐广，臣僚家有叙书者，朕先借其目参校，所少并令抄补，所得甚多，信非时手，不能备此。今秘阁之后新衣库，虽有栋宇，地犹狭隘。朕累令经度，若迁此库，以广其地，尤为佳事。』当谕刘承池增葺之。

帝宴饯侍讲学士邢昺于龙图阁，上挂《礼记·中庸篇》图，昺指『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之语，因讲述大义，序修身尊贤之理，皆有伦贯。坐者耸听，帝甚嘉纳之。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幸曲阜，谒文宣王庙。有司定仪止肃揖，帝特拜。又幸孔林，以树木拥道，降舆乘马，诣坟拜奠。帝曰：『唐明皇褒先圣为主，朕欲追谥为帝，可乎？』当令有司检讨故事以闻。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称王，不当加以帝号。遂止增美名。

帝命王旦选儒学之士，旦荐崇文院检讨冯元。帝召见，命讲《易·泰卦》。元进说曰：『地无为泰，以天地之气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与，则可以辅相天地，财成万物。』帝悦，赐之绯章服，称旦善择才。

天禧元年二月，诏太子中允、直龙图各冯元讲《易》于宣和门之北阁，待制预焉。自是，听政之暇，遂以为常。

三年九月，召宰臣、枢密、两制及东宫僚属，于清景殿观书。以《青宫要纪》事有未备，因博采群书，广为《承华要略》十卷，每卷著赞，以赐皇太子。至是书成，故召近臣观焉。

太宗时，邢昺尝纂《礼选》以献。其后，帝阅书禁中，得其本，作赞以示近臣曰：『朕在东宫，昺为侍讲，尝遍讲九经书，亦有三五过或十余过者，唯《尚书》凡十四讲。盖先帝慈旨勉励，每旦听书，食讫习射，使与兄弟朝夕同处。所习者，文武二事尔。

帝与诸王宗室友爱最笃，然动有戒谕，或问其讲习《为学》，则喜见颜色，形于奖劝。编修君臣事迹，日进草三二卷，帝虽政务繁剧，亦中夕披阅，条其舛互，纤悉穷究。诸儒疲于应对，为文务求温雅，制述尤多。中外疏奏歌颂，无不重复省览。暑月或衣单幭，流汗浃体而详览不辍，文忠正政之外，无他如玩。帝读经史，摭其可以为后世法者，著《正说》五十篇。其后仁宗御经筵，命侍臣日读一篇。

【译文】

真宗膺符稽古成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宋真宗生性敦厚，崇尚文雅。自离开朝廷作藩王以后，一心一意地以讲学经史，撰文记事，作诗填词为乐事，王宫中游玩休息的场所，到处都存放着图书，置备着笔砚。待到他即位为皇帝以后，时常召唤诸王府侍讲邢昺和国子监直讲孙奭等人，轮流为他讲说，互相就经书的义理进行质问答辩，要好长好长时间才作罢。

咸平元年（九九八年）正月，真宗下令有关部门，选择适当的人任职负责详细地校正经籍，因此着意访求对于经书之义理解透彻并能向别人解释清楚的人。参知政事李至推荐道：『国学里任讲书官

的崔颐正，对于所有的经书都很精通，而且特别善于解说经义。此人不知陛下以为如何？』真宗答道：『我每天在宫中呆着没事干，非常喜欢听人讲说历史故事。一直在找担当此职的合适人选，特别不容易找到。』第二天，便召崔颐正入宫到景福殿讲说《尚书》，又到宫中的花园里讲说《大禹谟》。从那以后，每天命崔颐正到皇帝御用的书院里去，随时准备对答真宗的询问。真宗对宰相说：『崔颐正为我讲经诵史，很有功劳。你们几位宰相再从站于朝廷班行的官员当中，挑选两位性情淳朴，精通经书大义，懂得处理事务如何会损怎样才能有益的人来，报姓名给我。』崔颐正为真宗讲《尚书》讲到第十卷，因为年老体弱，感到走起路来步履艰难，便上表要求退休。真宗接到退休申请，命崔颐正坐下，详细地询问了他的身体情况，答应他即以原本担任的职务退休，并可仍旧在国学中担任直讲官。

咸平二年七月，任命兵部侍郎杨徽之、户部侍郎夏侯峤两人并为翰林侍读学士，任命国子祭酒邢昺为翰林侍讲学士，任命翰林侍读吕文仲为翰林侍读学士。按，唐朝开元年间朝中始设侍读，其后又有翰林侍读学士一职。自五代以来，由于四方多事，战乱频仍，当时的帝王都崇尚武力，没有精力去研究学问，所以这个职务已经被废除很久了。太宗在位时，崇尚儒家经术，当朝处理政务的闲暇时间，总是以读书为乐趣，读起书来，经常持续到半夜，都不肯放手。从那个时候开始（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太宗才任命吕文仲为翰林侍读，让他住在宫中值班，以备读书至半夜，遇有疑难时顾问。那时虽然设了这么一个职务，但地位并不高。真宗为人聪明，熟悉历史，当然知道这段缘由，他首次正式设置这个官职，挑选年纪大的向有德行的学者任职，其官职在朝官的秩列中列入翰林学士同等俸禄和赏赐等，也都与翰林学士同样对待。此外，又在秘阁里设置了值班室，侍读官轮流值班，侍读官天

天都到，每天白天供应上好的饭食，夜晚则让他们轮流睡觉。真宗曾对身边的侍臣说：『我在听政之外，从来没有浪费过一点儿时间，探求经史的深奥精微的意义，是我一向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古往圣贤所被记于经书中的深奥的思想，我总有弄不明白的地方，也难免将老师们讲的给忘记了。昨天我已设置了侍讲、侍读学士。从今天起，我命令管理馆阁书籍的宦官，每天要把当天夜晚值班的侍讲、侍读官的名单填写好给我送进来，我要召见他们，问他们问题。』此后，真宗果然时常召这些值班学官入内访问，有时甚至要持续到半夜。

范祖禹说：太宗时开始命吕文仲入宫侍读；真宗时正式设置了侍讲、侍读学士学官；仁宗时则开辟了迩英、延曷两处殿阁，每天把讲读经史当做一项必做的常事。这样几个朝代下来，一个一个的开明帝王承前启后，只有增加，没有减损，日愈勤学，决不懈怠，这正是可以流传给子孙后代的法宝。所以在大宋王朝统治期间，国家能有一百三十年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是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再没有出现过的太平盛世。这样的局面是怎么来的？完全是因为宋朝开国之初列祖列宗为皇帝者没有一个不热爱学习的缘故啊！

咸平二年（九九九年）七月，真宗到国学，拜谒先师孔子并观看《三礼图》。之后，召祭酒邢昺、直讲崔偓佺讲说《尚书·大禹谟》一篇，随从官员均侍座于旁。真宗说：『崔偓佺所讲的能很准确地表达经书的含义。非常值得称赞。』于是赐给崔偓佺红色花纹的官服；邢昺以下的官员，各赐给器具和钱币。

真宗到宫中休息的便殿，命翰林侍讲学士邢昺讲《左氏春秋》，侍读也参预了讲读。

咸平五年（一〇〇二年），《春秋》讲解完毕，邢昺说：『《春秋》一经，很少有人从头至尾地听

讲下来，多数人都是听到一半就放弃了。』真宗说：『勤于学习，多多读书，由此给人带来的益处，可以胜过任何其他事情。而且能够为你处理政务提供最大帮助的，也没有什么能超过经书。我在处理政事和空闲时间里，把学文学史当做惟一的乐趣，与诸多学者讲论经书大义，往往一天要研究好多个时辰，哪里有疲倦的时候。』

十月，真宗召常在自己身边的近臣，一道去龙图阁参观那里的藏书。真宗说：『我从小至现在读经书典籍，这期间有过几次过失。在东宫作太子时，一心只想着要编一部书目，对于遗失散乱的图书，曾想尽办法到各处去买，而且很有收获。如今我已经过东宫藏书书目分类编成正本，除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三馆及秘阁以外，又于后苑和龙图阁各存放了一本。但可惜的是在编这个书目时对藏书校对不够很精确，比如《青宫要纪》、《继体治民论》本是一书两名，却并列在篇目之中错当成两部书了。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因为在购书的最初阶段，注重的是书的数量要尽可能地多，并不嫌书的重复购买。现在看起来，一书而列了两目，确实没什么意义。

景德四年（一〇〇七年）三月，真宗又带领近臣到玉宸殿去参观藏书。玉宸殿是真宗睡觉的寝宫，宫中的帷帐被褥都是用黄色的丝绸制作的，丝绸上并无图案。寝宫里分门别类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八千余卷图书。真宗对随他来的近臣做着解释：『这些藏书全部都是经过多次校订的正经、正史，像小说一类的其他图书不在这里存放，因为这玉宸殿就附建在皇宫中，皇帝看起书来最方便。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搜访图书，搜集到的图书越来越广；凡在朝廷或官府做事的臣僚家中有藏书的，我便先借来他的书目与自己的藏书书目相对照，如果发现有我这未藏的书，便立刻命人抄补，通过这种方法，收集到很多图书。相信如果不是当代最大的藏书家，不可能有我这么丰富的高质量的藏书。现在在秘阁

后面有座新衣库房，虽然有些房屋、建筑物，但地方还嫌狭窄。我已经多次命人做过规划，假如迁走这座仓库，将秘阁的地盘扩展些，那是件好事。』当即传命要刘承珪按真宗的意图扩建藏书阁。

真宗在龙图阁设宴为侍讲学士邢昺饯行，龙图阁的墙上挂着一幅《礼记·中庸篇》图，邢昺手指着『为天下国家有九经』那句话，讲述它深奥的含义，叙述修养个人道德品行、尊敬有学问才能的贤人的道理，所讲的都是既有次序有条理，又融会贯通，坐着的人都耸着耳朵、全神贯注地倾听，真宗对他所说的也很赞同。

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年）十一月，真宗来到曲阜，拜谒文宣王孔夫子庙。随行礼官制订的拜谒礼是肃立作揖，真宗却自作主张特地行了跪拜礼。接着又来到孔林，因为树林茂密拥塞道路，真宗下轿改为骑马，一直走到孔子墓地跪拜祭祀。真宗对随从说：『唐明皇褒扬先圣孔夫子为王，我想再把他追谥为帝你们看可以不可以？』遂即命令掌管谥法的官员查看有关文件，看看有没有同类的事，并报告给他。这时随行官员中有人讲说孔子只不过是周天子的陪臣而已；周天子只称王，孔子不应当加帝号。真宗这才放弃了给孔子加帝号的念头，只给增加了些美好的头衔。

真宗命王旦遴选精通儒学的人才，王旦推荐了崇文院检讨冯元。真宗召见了冯元，命他讲说《易·泰卦》。冯元阐说道：『地为天泰的意思是天地两气相交。为君之道最高尊贵，为臣之道最为卑下，只有上下相通，才能辅佐天地，节制万物。真宗听了很高兴，赏赐冯元一套紫色图案的官服，并称赞王旦善于选拔人才。

天禧元年（一〇一七年）二月，下诏命令太子中允、直龙图阁冯元在宣和门北阁讲解《易经》，并令侍制也都参加。从这以后，在坐朝听政、处理公务之后到宣和门北阁听讲，也就成为日常活动

了。

天禧三年九月，真宗召集宰相、枢密使、内外两制等官员及太子东宫属官，一起到清景殿观看藏书。真宗认为《青宫要纪》一书记事不全，所以广泛地从各种各样的书籍中摘取材料，把它扩编为《承华要略》十卷，每篇都写了评论，将该书给皇太子作为学习的教材。到这个时候《承华要略》编撰成功，所以召集跟随于身边的官员来看看。

太宗在位的时候，邢昺曾经编撰过一部《礼选》进呈给太宗。以后真宗在宫中读书时见到了这部书，便给这书写了篇赞扬的书评，拿给身边的大臣看，说：『我在东宫作太子时，邢昺为侍讲官，曾经把九部经书全部讲过。其中有些经书讲了三五遍，有些讲了十余遍；唯独《尚书》，足足讲了十四遍。当时先帝太宗对我十分慈爱，常常勉励我努力学习。我每天白天听书，吃过饭后练习骑马射箭等武艺，与诸位弟弟朝夕都在一起，学习处理政务和带兵打仗，文武两方面的本领。』

真宗和诸王及宗室子弟们相处得非常友爱融洽，但对他们的行为，时常进行约束和指点，有时问到他们讲习《为学》的情况，脸上马上露出高兴的表情，立即做出表扬和指导。有关部门编撰的《君臣事迹》，每天要呈送进来的两三卷的草稿，真宗虽然政务极其繁重，也要在夜里进行翻看，调理其中互相抵触的地方，对于稿中的非常细小的不妥当处都要追究到底，搞得编书的一帮学者们焦头烂额，忙着应付真宗的询问。真宗写起文章来，很讲究行文温和雅致，这类的著述很多；对于朝臣或外臣所上的书奏、诗词等政论或文学作品，没有不重复看个两三遍的；夏天最热的日子里，真宗有时只穿一件单衫，汗流浃背，尽管到了这种程度，仍然仔细地翻阅每篇文章，不肯停顿；在阅读文学、史学书籍之外，没有其他的爱好。真宗在阅读经书史籍时，摘录了其中可以让后世子孙在政事和行为方

面作为榜样的许多故事，把它们汇编起来，撰成《正说》五十篇。后来仁宗即位，到他专设的读书处经筵厅讲学经史时，每天都要让侍臣们给念一篇。

宋英宗皇帝

【原文】

英宗体乾膺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神宣孝皇帝，神宗英文烈武圣孝皇帝上英宗体乾膺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神宣孝皇帝，初在睦亲宅，闭门读书，终日未尝燕游慢戏，服御俭素如儒者。吴王宫教授吴充进《宗室六箴》，一曰视，二曰听，三曰好，四曰学，五曰进德，六曰崇俭。仁宗以付大宗正司，帝书之屏风，常视以自戒。及为皇子，召本宫教授周孟阳为辞奏。孟阳有所劝谕，即谢孟阳而拜。嘉祐七年迁入内，行李萧然，无异寒士，有书数厨而已。宫内外闻之相贺。八年四月即位。十月，辅臣请如乾兴故事，双日召侍臣讲读。帝曰：『当俟三庙毕，择日开经筵。』十二月己巳，始御迩英阁，召侍读侍讲讲读经史，讲《论语》『学而时习之。』侍讲吕公著曰：『《说命》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然则人君之学，当观自古圣贤之君，如尧舜禹、汤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国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诸生治章句、解训诂而已。』又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公著言：『自天子至于庶人，皆须朋友讲习。然士之学者以得朋为难，故有朋自远方来则以为乐；至于王人之学，则力可以致当世之贤者，使之日夕燕见，讲劝于左右，又以左右之贤为未足，于是乎访诸岩穴，求诸滞淹，则怀道抱德之士，皆不远千里而至，此天子之有朋自远方来者也，其乐亦大矣。』又讲『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见知于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见知于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未孚，人心有未服，则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诞敷文德，文王

之皇自敬德是也。」

【译文】

英宗皇帝早年在睦亲宅居住，闭门不出，从早到晚专心读书，从不宴饮游乐、怠慢戏耍。他穿着很朴素，像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吴王宫教授吴充进献《宗室六箴》：『一看、二听、三向善、四好学、五进美德、六崇尚俭朴。』仁宗皇帝把它交给掌管皇室亲族事务的大宗正司。英宗亲自把它书写在屏风上，经常观看，以警戒自己。当他被立为皇太子后，下诏让自己的宫中的教授周孟阳做以文辞向他进言的官。每当周孟阳有所劝告，英宗当即便为感谢周孟阳而下拜。嘉祐七年，英宗迁入内宫时，行李很简单，完全像一个贫寒的读书人，所有的只是几橱书而已。中外人士听到这件事，都为将有这样一个崇俭好学的皇帝而相互庆贺。

嘉祐八年四月，英宗即位当皇帝。十月辅佐大臣们奏请，要求像乾兴年间仁宗即位后所做到的那样，每逢双日，召侍臣进宫讲学读书。英宗皇帝说：『应当这么做，一俟祔庙祭祀完毕，选择合适的日子，开经筵讲席。』十二月己巳日，皇上第一次在迩英阁召侍读、侍讲，讲读经史。当讲到《论语》中『学而时习之』时，侍讲吕公著说：『《说命》这篇文章说：「只做人之君王要求多了解时事就行了，唯有要创建事业，这样学习古人的训导，才会有收获。」然而作为一国的君王，在学习中，则应当注意观察自古以来圣贤之君，如尧、舜、禹、汤、文、武等用心所在，以探求治理天下国家的有效途径。绝不要像那些博士出生，只是为了研究圣人的文章、语句，解读前人的训诂。』在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时，吕公著说：『从天子到平民读书，都需要和朋友在一起讲习。但是读书人中那些潜心治学的人，认为能够得到一个知己朋友是不容易的。所以，当朋友从远方来看自己，就

被认为是令人非常高兴的事。至于做君王的人要学习，则有能力下诏致当今世上贤明，让他朝夕都能进见，在身旁讲经劝谕。要是认为身旁的贤者还不能满足需要，就可以四处求访那些有才德而没有被发现的人。这样，那些身怀道德的贤士，都会不远千里而来，这才是天子的「有朋自远方来」呀！其中包含的快乐也是大得很哪。』又讲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别人不了解自己而不恼怒，不也是君子吗？）吕公著说：『作为下面的人而不为皇上所认识知道的多得很；但是作为皇上，也有不为下人所了解的地方。所以，古代的君王，当其政令还有人不信服、人心还没有完全归附时，则是反省自身、完美德行，而不是对他们加以怨怒。譬如舜帝之以礼乐教化进行统治，周文王以尊敬德才夺取天下，都是这样的例子啊。』

【原文】

治平元年四月甲申，御迩英阁。前此，帝谕内侍任守忠曰：『方日永讲读官久侍对，未食，必劳倦。自今视事毕，不俟进食，即御经筵。』故事，讲读毕拜而退，帝命毋拜，后遂以为常。讲《论语》『宰予昼寝』，吕公著曰：『旧说宰予昼寝，寐也。侍读学士臣敞以为，《礼》「君子昼不居于内，夜不居于外」。宰予昼居于寝，故孔子非之。』帝自即位感疾，至是犹未全安，多不喜进药。吕公著讲《论语》『子之所慎齐、战、疾，因言：「有天下者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其于斋戒祭祀，必致诚尽恭，不可不慎。古之人君，一怒则伏尸流血，则于兴师动众不可不慎。至于人之疾病，常在乎饮食起居之间，众人所忽，圣人所慎。况于人君，任大守重，固当节嗜欲，远声色，近医药，为宗社自爱，不可不慎。」帝纳其言，为之三首而动容。自是，每因讲进戒，帝必肃然。讲《论语》『九人而已』，吕公著曰：『旧说其一人谓文母。侍读学士臣敞以为子无臣母之理，「有妇人焉」盖邑姜也。自古有道之

君必求贤妃贞女以为内助，朝夕警戒，然后可以成德。故《诗》美后妃，能辅佐君子，《易》称家道正而天下定矣。』讲『毕宫室』，公著曰：『昔周宣王初即位，更为俭宫室，小宗庙，而致中兴之功。后世人君多务盛宫阙之制，穷土木之工，欲以夸四方而示后人。辅弼之臣虽萧何、谢安，犹不免此惑。殊不知夏禹、周宣恭俭之德，可以垂美于万世也。』帝因辅臣奏事语及吕公著，欧阳修曰：『公著为人恬静而有文。』帝曰：『比于经筵，讲解甚善。』六月己亥，诏曰：『虽王子之亲，其必由学；惟圣人之道，故能立身。若昔大猷自家刑国。今一祖之后、诸宗之支，亦尝著令于前，命官以训，或兼职他邸，或备位终年，诱导之宜，灭裂无状。盖命不持固，事遂因循。特诏近臣并荐能者，使成童而上讲诵经书，小学之居通达名数，朝夕劝善，日月计能，固当渐渍简编，敦修志业，与其趋异端而无守，岂若就有道而自修。居常谨思，戒在中止，其子弟不率教约。俾教授官、本位尊长具名，申大宗正司量行戒责。教授官不职，不能勉励，大宗正司察访以闻。』初，帝以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余人，其奉朝请者四百余人，而教学之官六员而已。因命增置，凡皇族年三十以上者，百十三人置讲书四员；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员；年十四以下者，别置小学教授十二员，并旧六员为二十七员，以分教之。帝谓韩琦等曰：『凡事之行，患于渐久而怠废。况为学之道，尤戒中止。诸宗室之幼者，仍须本位尊长，常加率励，庶不懈惰。可召舍人谕此意，作诏戒勉之。』故有是诏。丙午，诏曰：『朕嗣守丕业，率循旧章。惟皇属之敦和，命宗臣而董正，累圣承继，百年盛隆，宗社庆灵，本支蕃衍。念其性本于仁厚，宜广学以勤修；顾其日益于众多，必增员而统理外，已诏于儒学，各选经师。内仍择于亲贤，共司属籍。庶乎协替其职，并修厥官。纠乃非违，以正为率，勉夫怠堕，惟善是从。』帝既命增置宗室学官，以谓宗室数倍于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乃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员，

以宗惠为之，而降是诏。九月，诏以五日开迩英阁，至重阳节当罢。侍讲吕公著、司马光言：『陛下始初清明，定亲近儒雅，讲求治术。愿不惜顷刻之间，日御经筵。』从之。

【译文】

治平元年四月甲申日，英宗到迩英阁。在此之前，皇帝曾传谕内侍任守忠说：『讲读官方日永服侍对答已很长时间了，还没有吃饭，一定疲劳困倦了。自今天起，看到朝事完毕，不必等待进食，即去经筵听讲。』讲读完毕，侍讲跪拜而退，英宗命令不须跪拜了。以后这便成了常规。在讲《论语》『宰予昼寝』时，吕公著说：『这句旧的解释是（宰予白天呆在卧室，睡觉也）。侍读学士刘敞认为《礼记》讲：「君子昼不呆在内室，夜不在外面睡觉」。宰予白天呆在寝室里，所以孔子批评他。』英宗自即位时便感染了疾病，到现在仍未痊愈，主要是不喜欢吃药。吕公著讲《论语》『子之所慎，斋、战、疾』时，为这个原因说：『有天下者，作为天地、宗庙、社稷的主子，他在斋戒、祭祀时，必须至诚恭敬，不可以不慎重。古代的君王，一发怒便要杀人流血，所以在决定兴师动众要打仗时，不可不慎重。至于人感染疾病，常在饮食起居之间。众人忽视这一点，圣贤之人却很注意。何况作为人君，责任大，担子重，本应当节制嗜好欲望，不贪声色，不拒医药，为祖宗社稷爱惜自身，对于疾病，不可不慎重对待。』皇帝接纳了吕公著的劝言，并为之低下了头。感动之心，现于面容。自这次起，臣下每因讲读而进言劝戒时，英宗必定肃然听之。

讲到《论语》：『九人而已』，吕公著说：『旧的解释说其中一人是周文王的母亲。而侍读学士大臣刘敞认为，做儿子的，没有把自己的母亲当做下臣的道理，「有妇人焉」指得是邑姜。自古有道明君，必然寻求贤良贞洁的女子作为内助，在身边能够常常警戒自己，这才可以修成大德。所以，《诗

经》赞美后妃能辅佐君夫、王子；《易经》说，治家之道若能端正的话，天下就安定了。』讲『卑宫室』时，吕公著说：『昔日周宣王即位之初，更是使宫室从俭，减小宗庙的规模，而实现了周室中兴。后世之君，大多好把宫阙规模搞得非常盛大。大兴土木，以向四方夸耀，向后人显示。即使像萧何、谢安这样著名的辅臣，也不能避免这样的迷惑。殊不知夏禹、周宣王恭俭之德政，可以成为万世之美传啊！』皇帝在辅臣奏事时谈到吕公著，欧阳修说：『公著为人恬静而有文才。』皇帝说：『比方，在讲席上，他讲得非常好。』

六月己亥日，英宗下诏说：『即使像王子这样亲近的人，他也必须经历学习过程。由于掌握了圣人的思想，所以才能树立己身。比如古时的大道法则，从管理家庭到治理国家都起作用。而今，作为同一祖先的后代，诸家宗室的支脉，也曾撰写法令，命令官员对其进行教诲。但他们或在别的府第兼任职位，或者终生占着职位不干事，对他们进行奖引教导的事宜，已破坏得不成样子。由于人的生命不能持久，而事业的延续却在于遵循已有的道德法则。所以特下诏身边的大臣，并引荐有能力的人，让十四岁以上的人，学习经书；处于小学年龄的人，则要通过学习达到能熟练地识名称、计数字。这样，朝夕劝导他们以形成良好的品行，日积月累以增强他们的才能。就一定会使他们逐渐喜好读书，以修养志向和学业。与其趋附异端邪说而丧失节操，还不如接受有道德的人的教诲，以自我修养。学习要严谨多思，力戒半途而废。若宗室子弟不服从教学约束的，让教授官、本家尊长开列名单，申报大宗正司，量其行为，给予惩戒责罚。如果教授官有不称职，不能给学员以劝勉鼓励的，大宗正司应经过察访，以告朕。』

讲学开始，皇帝让各宗室自率府副帅职位以上八百余人，其中奉命早朝请命的官员四百余人听

讲。可是，从事教学的官员只有六人。因此，命令增加教授官。规定，凡皇族年龄在三十岁以上者，共一百三十人，增设讲书官四员；年龄在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者，共三百零九人，增设教授官五员；年龄在十四岁及以下者，另设置小学教授官十二员，加上旧有的六员，共二十七员教授官，分别对他们实施教学。皇帝对韩琦等人说：『所有事业的推行，都有时间久了出现懒散荒废的弊病，何况在求学的道路上，尤其要防止中途废止。各宗室之年幼者，仍须由本人的长辈，经常加以约束和鼓励，可望不至怠懈懒惰。你可以召集舍下之人，传谕这个意思，作为皇上的诏戒，以勉励他们。』因此，就有了如下的诏书。丙午日诏曰：『朕（本皇）继承掌管天下大事，都遵循既定的章法。唯独先皇关于亲厚和睦的嘱托，命令宗室大臣遵循并加以督察纠正。历朝承继，使大宋百年来昌盛兴隆。国家祥瑞，子孙繁衍，考虑到宗族仁厚的本性，适宜广博学识，勤于修身。只是学习的人日益众多，必须增加官员统领管理。对外，我已下诏于教授儒学的学校选拔经师；对内仍要在亲族贤明中选择，共同掌管家族名册。但愿他们在完成职责上能相互协助替代，共同修学缺官所需的学问。要纠正错误或违规的行为，以正确者为表率；勉励那些怠堕者，教大家唯善是从。』皇帝既已命令增加设置以宗室中选出的学官，便以宗室人口数倍于前，而宗正司事务也滋生繁多，就增加设置同知大宗正事官一员，让宗惠担任，从而降了这一诏书。九月，下诏以五日开始在迩英阁讲筵，所以至重阳节应当结束。侍讲吕公著、司马光进言说：『陛下初登皇位便政治清明，更宜亲近儒雅，讲求治国之术。愿不惜转瞬即逝的光阴，每日去经筵讲读。』皇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原文】

帝御迩英阁，未尝发言，有所询问。二年十月，侍讲司马光上言：『臣闻《易》曰「君子学以聚

之，问以辨之。」《论语》曰：「疑思问」。《中庸》曰：「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学非问辨，无由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识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或虑一时记忆不能详备者，许令退归讨论，次日别具札子敷奏。庶几可以辅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帝嘉纳之。壬子，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卢士宗知青州。士宗在侍从逾十五年，因对，乞补外，入辞，帝谓曰：「学士忠纯之操，朕固素知。岂当久处外邪？」且命再对。

【译文】

英宗皇帝到迩英阁只是听讲，未曾发言问过什么问题。治平二年十月，侍讲司马光上言说：「臣闻《易经》讲：「君子在学习时，要把所学的东西聚集起来，要通过提问，辨明所学的东西。」《论语》讲：「有了疑惑，就想要问」。《中庸》说：「有不明白的问题，问了之后还不知道，不是错；有辨认不清的事情，经过辨论仍不明白，也不是错。」从这些言论中可知，学习不经过提问辨论，是无法得到启发明白的。如今陛下如果都是默默地学习，不加以询问，虽然作为学识疏浅的臣下由此而幸运，但臣私下恐怕这样不能宣扬畅达经书的主旨，增益补助圣上的理性。希望陛下从今天的讲筵起，如有臣等讲解不详尽的地方，乞请赐以诘问。或者考虑到有一时记忆中准备不详的问题，准许令他在课后退下回家讨论，次日另外写好札子呈奏。这或许可以帮助实现研究古籍的志向，带来日日更新的收获。」皇上赞许并采纳了司马光的意见。壬子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卢士宗赴任青州知府。士宗在皇帝身边当侍从已超过十五年了。因为向皇帝奏请乞求补缺到外地做官，入宫向英宗辞行。皇帝说：「学士忠良纯正的操行，朕一向知道，怎么应当长久在外做事呢？」并且命他以后再谈此事。

【原文】

三年四月辛丑，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集《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光奏曰：『臣自少以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烦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几，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讫五代，正史之外，旁采它书，凡关国家之兴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王者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私家区区，力不能办，徒有其志，久而无成。乡曾以战国时八卷上进，幸蒙赐览。今所奉诏旨，未审令臣续成此书、或别有编集？其续此书，欲乞亦以『通志』为名。其书上下贯穿千有余岁，因非愚臣所能独修。伏见韶州翁源县令刘恕、将作监主簿赵君锡，皆有史学，为众所推，欲望差此两人与臣同修，庶早成书。』诏从之，而令接所进书八卷编集，俟书成取旨赐名。其后君锡父丧不赴命，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攽代之。六月壬子，改清居殿曰钦明，召直龙图阁王广渊书《洪范》于屏。帝谓广渊曰：『先帝临御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无为。朕方属多事，岂敢自逸？故改此殿名。』因访广渊先儒论《洪范》得失。广渊对以张景所得最深，以景为七篇进。明日，复召对延和殿，帝曰：『景所说过先儒远矣。以三德为驭臣之柄，尤为善论。朕遇臣下，常务谦柔，听纳之间则自以刚断。此屏置之坐右，岂特无逸之戒也。

臣祖禹曰：『英宗皇帝潜德藩邸，修身好学，故仁宗以知子之明付畀大业。及即位，首劝宗室以学，盖帝以身先之知学之益不学之损也。又谕辅臣，凡学之道，戒在中止。圣训岂不大哉！』

【译文】

治平三年四月辛丑日，英宗皇帝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集《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司马光上奏说：『臣自年少开始至今，流览群史，见到那些纪传体史书文字烦多，虽有闭门隐居专事研读的学者，往往也不能普遍深入地阅读。何况对于日有万机，同时又想遍知前世统治得失的帝王来讲，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臣不自量力，欲将上自战国，下于五代，除正史以外，旁采它书，凡有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其善可以效法，其恶可以为戒而帝王所宜知的事件，大略依《左氏春秋传》的文体，按年代顺序编一本书，名叫《通志》。对史籍中其余浮华冗杂的文字，尽数删去，不予记载。也许可以使这本书听起来、看起来不太费辛劳，而又能使所闻所见甚为广博。然而，由于个人力量渺小，不能办这件事，使我徒有这种志向，而久久不见成效。从前，臣曾以编好的战国时代的八卷上进，有幸蒙皇上赐览。今天奉皇上诏旨，不知是令臣续成此书，还是有了别的编集？若是续编此书，想乞求也将《通志》定为书名。这本书内容上下贯穿二千余年，因此，不是愚臣独自所能修编完成的。我了解到，韶州翁源县令刘恕，将作监主簿赵君锡，都有很深的史学造诣，为众人所推崇。希望皇上能差遣此二人与臣共同撰写，可望早日成书。』皇帝下诏同意。并令接所上进的八卷继续编集，一俟书成，到皇上这里取旨，给书赐名。以后，赵君锡之父去世，不能赴任。帝命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攽代替他。六月壬子日，改清居殿为钦明殿。召直龙图阁王广渊将《洪范》书写在大殿的屏风上。皇帝对广渊说：『先帝在位四十年，天下太平，得以无为而治。朕即位以来，正直多事之时，岂敢自居安逸？所以改此殿名。』也就因此同先儒广渊讨论对《洪范》研究的得失。广渊在回答中说当今以张景研究《洪范》所得最深，并将张景所写的七篇有关文章进献。第二天，皇帝又复召王广渊在

延和殿对话。皇帝说：『张景文中所说的，其水平大大超过先儒了。其中以『三德』作为驾驭群臣的权柄，是尤其好的论点。朕对待臣下，平常必须谦逊柔和，但对臣下意见的倾听接纳，则自己刚强果断予以决定。这个屏风放在坐位的右边，岂只是不贪图安逸的警戒呢！』

臣范祖禹认为：『英宗皇帝，早在侯王位置时已具有美德。注意品德修养，善好读书学习。所以仁宗皇帝以对自己义子了解的英明，付给他掌管国家的伟大事业。及至即位，第一件事就是劝宗室成员读书学习。原因在于，皇帝自己就已经率先学习，深知学习的益处与不学习的害处啊。并且还劝谕辅佐大臣，读书学习切忌半途而废。圣上的训谕是多么伟大呀！』

宋神宗皇帝（上）

【原文】

神宗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嘉祐八年五月，始听讲读于东宫，天资好学寻绎，读问有至日昃。内侍言恐饥当食，上曰：『听读方乐，岂觉饥耶！』英宗以上读书太多，尝遣内侍止之，当讲读，正衣冠拱手，虽大暑未尝使人挥扇。待宫僚有礼，伴读王陶入侍，上率弟颢拜之。陶读《舜本纪》，言舜孝友事，大爱慕之。又读《商书》纪仲虺作诰，因取《尚书》读之，至『志自浦九族乃离』，上曰：『微子去之，是也。』

【译文】

神宗皇帝于嘉祐八年五月开始在东宫听讲读。他天资好学，为寻求事理，读书提问，有时一直要学到太阳偏西。内宫侍从催他说，不要饿坏了身体，应当吃饭了。但皇上却说：『我听讲、读书兴趣正浓，哪儿觉得饿呀！』英宗以皇上读书时间太长，曾派遣内侍让他停止。每当听讲读时，神宗总是

衣冠整齐、拱手端坐。即使是暑天大热，也不曾叫侍从橇扇。他对待宫中幕僚很有礼貌，伴读王陶入宫侍奉皇上读书，皇上带他的弟弟赵颢一起拜见老师，王陶讲读《舜本纪》，说到舜帝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事迹，皇上大为爱慕。在讲到《商书》记载的『仲虺作诰』（指商汤的左相仲虺作诰业劝戒商汤）的事时，因这句话，皇上就取来《商书》读。读到『志自满，九族乃离』（若人的心志满足于自己已有的成绩，虽是九族至亲，也会背离他的）时，皇上说：『商纣王的同母庶兄微子离纣王而走，是对的。』

【原文】

治平四年正月，上即位。九月壬寅，以御史中丞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先是，光言：『张方平不当参知政事，臣是人言。臣言果是，则方平当罢；若其非是，则臣当远贬，今两无所问，而臣复还翰林，仍加美职，未晓所谓。乞察臣所言是非。』知通进银台司吕公著亦言不当，遽罢光中丞，对还制书。上手诏光：『得卿奏及谓因前日论方平不当，故有易命。此乃卿思之误，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经术行义为世所推，今将开筵英之席，比得卿朝夕讨论，敷陈治道，以箴遗关，故命进读《资治通鉴》。此朕之意，皎然易见也。况命卿之旨在二十六日登对前，苟朕以言事罪卿，岂复迁卿美职必谅朕诚，更勿横虑，可即授告敕。吕公著所以封还者，盖不知此意耳。俟对日，朕亦当谕旨。』十月己酉，初御迩英阁，召侍臣讲读经史。退，上独留吕公著，谓曰：『朕以司马光道德学问，欲常劝讲左右，非谓其言事也。』公著复奏，遂解银台司。甲寅，司马光初进《资治通鉴》，上亲制序面赐光，令候书成日写入。又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壬戌，上出知凤州梁泉县令范亦颜所上书及濮庙议，命迩英阁讲读官定夺，仍宣谕立濮王庙非先帝本意。先是七月，亦颜以前嘉州夹江县令投捡上书

曰：『《中庸》曰：「非天子，不议礼。」是礼惟天子可得而议也。仁宗皇帝无子，子英宗而付以天地之大业，盛德也。英宗皇帝即大位，服三年，日夜惴栗，恐坠休绪，大孝也。诏议变礼，以尊所生，不忘本也。濮安懿王之于英宗，伯父也，原所生之德，而尊其号，冠之以所封之「濮」，明止一国，非所以兼天下也。』于是右司谏刘庠、侍御史张纪、殿中侍御史张唐英、监察御史里行唐淑问等，言：『亦颜小臣，敢为欺罔，以白为黑，惑乱天听，诖误圣朝，挟邪乱政，渐不可长！』乃降亦颜下县主簿尉。

【译文】

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九月壬寅日，任命御史中丞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先前，司马光曾向皇上启奏说：『张方平不应担任参知政事这一官职。臣下同意大家的意见。假如臣说的果然对，那么方平应当罢免；如果说的不对，那么为臣应当受到贬职外地的处罚。现在对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责问，而且让臣又回到翰林院，并委以很好的职位。我不明白是什么缘由。乞望皇上能察明臣所说的是还是非。』知通进银台司吕公著也说司马光不对。遂即罢免了司马光御史中丞的职务，并将皇上的命令封好退回。于是神宗亲自写了诏书给司马光说：『得知卿上奏谈到，你认为是因为前日评论张方平不恰当，才有更换职位的任命。这是你领会错了，并不是朕本来的意思。我以你在经史研究、行为礼义上，都为世人所推崇；而今筵英讲席将开，为能就近得以和爱卿朝夕讨论，广泛陈述治国之道，用以针砭政治的遗漏和不足之处。所以，才命你进宫来讲读《资治通鉴》这正是朕的本意。明明白白，显而易见。况且任命你的旨令是在二十六日，在你奏对之前就已下达了。假若朕以张方平的事怪罪你，为何又让你迁任更好的职位呢？想必应当谅解朕的诚意，更不要横猜多虑了。你可以立即接

受任命，吕公著所以把我的任命书封好退还，原因是他不知道我的这番意思。等到上朝奏答的日子，朕也要当面给他下指示。』

十月己酉日，神宗第一次到迩英阁，召侍臣讲读经史。讲完众人退下后，皇上把吕公著一人留下，对他说：『司马光道德学问均为表率，我想让他经常在身边劝谕、讲说，并非因为他说张方平这件事我才这么做的。』吕公著再次为司马光的事上奏，遂即发送银台司备案。甲寅日，司马光首次进上《资治通鉴》，皇上亲自写了序言，当面赐给司马光，命令等全书完成之日，写入书中。同时又将颍王宅邸所藏旧书二千四百零二卷赐与司马光。壬戌日，皇上出示凤州梁泉县令范亦颜所奏的关于修建濮庙的议案，命迩英阁的讲读官商议决定，并且再次向群臣宣布解释说，立濮王庙并非先帝（英宗）本人的意愿。在这之前，七月的时候，范亦颜就以前嘉州夹江县令的资格上书说：『《中庸》写到：「不是天子不谈礼制」是说礼制只有天子才可以谈论。仁宗皇帝没有儿子，以英宗为自己的儿子，而交给他治理天下的大业，其德盛大。英宗皇帝即位后，为仁宗服丧三年，日夜不安，总怕自己继承的美善的事业衰落。这是极大的孝悌啊！而今，若下诏陈述改变礼制的原因，以尊崇生父，是不忘本啊。濮安懿王对英宗皇帝来讲，是伯父。追溯生养之德，而尊崇他的谥号，在上面冠以他的封王「濮」，明确这只是指在一个封国内的尊崇，并非兼受天下尊崇是可以的。』听了这段奏书，右司谏刘庠、侍御史张纪、殿中侍御史张唐英、监察御史里行唐淑问等人说：『亦颜这个小官，竟敢进行欺骗蒙蔽，以白为黑，惑乱天子，贻误神圣朝廷，挟持邪恶，扰乱政纲，这种风气，不可助长！』于是，将范亦颜降为下等县的主簿尉。

【原文】

熙宁元年四月庚申，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等言：『窃寻故事，侍讲者皆赐坐，自乾兴以后讲者始立，而侍者皆坐听。臣窃以谓，侍者可使立，而讲者当赐坐。乞付礼官考议。』诏太常礼院详定以闻。后判太常寺韩维、刁约，同知太常礼院胡宗愈言：『臣等窃谓，臣侍君侧，古今之常，或赐之坐，盖出优礼。祖宗以来，讲说之臣多赐坐者，以其敷畅经艺，所以明先王之道，道之所存，礼则加异。太祖开宝中，李穆荐王昭素于朝，召对便殿，赐坐，令讲《易》乾卦。太宗端拱中，幸国子监，升辇将出，顾见讲坐，因召学官李觉讲说。觉曰：「陛下六飞在御，臣何敢独升高坐？」太宗为之降辇，令有司张铁幕设别坐，诏觉讲《易》之泰卦。今列侍之臣尚得环坐，执经而讲者，顾使独立于前，则事体轻重诚为未安。臣等以为，宜如天禧旧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判太常寺龚鼎臣、苏颂周孟阳，同知太常礼院王诉刘攽韩忠彦言：『臣等窃谓，侍从之官见于天子，若赐之坐，有所顾问，犹当避席立语。况执经人主之前，本欲便于指陈，则立讲为宜。若谓传道近于为师，则今侍讲，解说旧儒章句之学耳，非有为师之是。岂可专席安坐以自取重也？又朝廷班制，以侍讲居侍读之下，祖宗建官之本意重轻可知矣。今若使侍讲者坐，其侍读当从何礼？若亦许之坐，则侍从之臣每有进说，皆当坐矣。且乾兴以来，侍臣立讲，历仁宗、英宗两朝行之，且五十年。岂可一旦以为有司之失而轻议变更乎？今人主之待侍臣，由始见以及毕讲，皆赐之坐，其尊德重道固已厚于三公矣，尚何加焉。其讲官侍立，伏请仍旧。』初，孙奭坐讲，仁宗尚幼，□案以听之。奭因请立讲，论者不以为是。王安石兼侍讲，请复乾兴以前故事，使预听者立，亦坐之日少而立侍之日多。于是，公著等遂同建明。已而，众议不同，上以问曾公亮，公亮但称：『臣侍仁宗书筵亦立。』后安石因讲赐留，上面谕

曰：『卿当讲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讲《礼记》，自今讲《尚书》。先是，王安石次未当讲，上命安石讲，至曾参《易箦》，安石曰：『圣人以义制礼，其详至于床第之间；君子以仁行礼，其勤见于将死之际。』上称善。未几，安石言：『《礼记》所载多驳杂，乞今讲《尚书》。』故有是旨。讲《甘誓》，『予则孥戮汝』吕公著曰：『古之仕者世禄，若身以罪戮，则子降为皁隶。人失位，死不入兆域。如此之类，皆耻累其世。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赏善及子孙罪恶止其身，非并杀其子也。』讲：『天乃锡王勇智』，上曰：『何以独言勇智？』吕公著对：『仲虺方称成汤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之。然圣人之德，当如《易》所谓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然后可为尽善矣。』

【译文】

熙宁元年四月庚申日，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等人进言：『臣私下翻阅我朝旧事，得知，讲经时侍者和讲者皇上都让坐着。从乾兴年后，讲经的才开始站着讲，而侍者都坐着听。臣私下认为，侍者可以让站着，而讲者应当赐予座位。乞求皇上让管礼仪的官考证史论。』神宗下诏让太常礼院详察认定后报告。然后，判太常寺韩维、刁约，同知太常礼院胡愈宗等说：『臣等私下认为，大臣站在旁侧侍奉君王，是从古至今的规矩。偶有赐大臣坐下，都是出于特殊的礼让。我朝祖宗以来，对从事讲经说史的大臣大多赐予坐着讲的原因，是以他们能很好地阐述经史的技艺，以昌明先王治理国家的道理，先王之道得以发扬光大，从而在礼遇上给予特殊优待。太祖开宝年中，李穆向朝廷推荐王昭素，皇帝召他在便殿问话，赐给他座位，听他讲《易经·乾卦》。太宗端拱年中，视察国子监，上车刚要出去，回头看见讲席，因此召讲学官李觉给他讲说。李觉对皇上说：『陛下就要乘车走了，臣下何敢独

升高坐？』太宗为此下车，叫有司张开小帐幕，另外设了座位，诏李觉讲《易经》中的《泰卦》。当今，列侍之臣尚得以环绕而坐；手执经卷讲课的人，反而让他独自站立于前。事情的轻重，确实是没有安排好。我们几个大臣认为，应当像天禧年间的旧礼制，让讲者坐着讲，以表明陛下坚持古制，重视礼制翟意愿。』判太常寺官龚鼎臣、苏颂、周孟阳，同知太常礼院王汧、刘攽、韩忠彦等说：『我们私下认为，当侍从的官在见天子的时候，若赐他坐下，当要回答天子的问题时，尚且应当离开席位，起立回答。何况手执经卷在人主面前，本来是想要便于指导陈述，这样还是站着讲授比较合适。如果认为传道接近于做老师，应当受到礼遇。则如今当侍讲的，不过是在解读讲说旧儒所写的文章、语句而已，并没有做老师所做的工作。怎么可以专设席位，安然就坐，把自己放在重要的地位呢？而且，朝廷官员的体制，把侍讲的职位排在侍读之下，从这里也可以了解祖宗建立这些官职孰轻孰重的本来意思。如果从今让侍讲坐着，那么应该给侍读什么样的礼遇呢？如果也允许他们坐下，那么做侍从的臣子，每当有事向皇上进言述说，都应当坐着了。并且从乾兴年以来，侍臣站着讲说经史，已经历了仁宗、英宗两朝，实行五十年了。怎么可以一朝因为有司的过失，而轻率地议论是否要变更这一原则呢？如今人主对待侍臣在开始见面和讲授完毕都赐与坐席让他坐下，可见皇上尊德重道的礼遇比对待三公都优厚了，还有什么再提高的道理呢？所以，讲经的官员站着侍奉，请仍按旧的礼制执行。』当初孙奭坐着讲授，仁宗尚处年幼，踮着脚尖站在案几边听讲。孙奭因此请求站着讲，说到这事的人不以为这是对的。王安石兼任侍讲时，请求恢复乾兴年以前的做法，让准备听讲的人站着，他自己讲授时，坐的日子少，站着讲的日子多。于是吕公著等人，都按王安石的做法去做。不久，众人有了不同的议论。皇上以此问曾公亮。公亮只是说：『为臣侍候仁宗出筵也是站着。』后来，王安石因讲经

筵皇上赐他留下。皇上当面对他说：『在该你讲的日子，可以坐着讲。』安石不敢坐，遂后便算了。十月壬寅日，神宗下诏，让讲筵暂时停止讲《礼记》，以今天开始讲《尚书》。在这之前，有一次，按次序并没有轮到该王安石讲的时候，皇上命安石讲。讲到『曾参易箦』（曾参在死之前要换床席的故事）时，王安石说：『圣人以大义制成礼法，其周详已达到床第之间的事情上了。君子以仁推行礼法，其勤勉到以至于在将死之际，也不忘按礼行事。』皇上称他讲得好。没有多久，王安石说：『《礼记》所记载的事理很杂乱，乞求从现在起讲《尚书》。』于是就有了上面改讲筵内容的旨意。讲《甘誓》『予则孥戮汝』（我则杀你子），吕公著说：『古代为官之人，世代受奉禄。如果他犯罪被杀身，则他的儿子就被降爵为奴隶。人失去爵位，死后也不能将自己埋入祖宗的坟地。这样做使人们都耻于因自己的原因而连累后代。其实，父子兄弟罪罚并不相互涉及，对其功绩善事的奖赏，要荫及子孙；对其恶行的治罪，至其本人而止，并不是要连其儿子也一起杀掉。』讲到『天乃锡王勇智』（是上天赐大王以勇敢和智慧）时，皇上问：『为什么只说到勇敢和智慧呢？』吕公著回答道：『仲虺只是称赞成汤能够征战、伐夏桀、拯救人民。所以，以勇敢、智慧评论他。然而，圣人之德行，应当如《易经》中所概括的那样：聪明、睿智、神武而不轻易杀伐。如此，然后才可以被称为尽善啊！』

宋神宗皇帝（下）

【原文】

熙宁三年九月戊辰，初御迩英阁讲读。己巳，召御史中丞吕公著来旦赴经筵。公著以台丞侍讲又兼经筵职遇讲读即赴。十一月庚辰，司马光讲《资治通鉴》、《汉纪》，至『曹参代萧何为相国，一遵何故规』因言：『参以无事镇抚海内，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

『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弊。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旧，虽周亦用商政也。《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然则祖宗旧法，何可变也？汉武帝用张汤之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宣帝用高帝旧法，但择良二千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帝初立，颇改宣帝之政，丞相衡上疏言：「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虚为此纷纷也。」陛下视宣帝、元帝之为政谁则为优？荀卿曰：「有治人，无治法。」故为治在得人，不在变法也。』上曰：『人与法亦相表里耳。』光曰：『苟得其人，则无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求人而缓于立法也。』壬午，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因言：『法不可不变。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正月始和置于象魏」是也；有五岁一变者，「五载一巡守」，考制度于诸侯是也；有一世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百世不变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司马光言汉守萧何之法则治，变之则乱。臣窃以为不然。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挟书律》，文帝《除收孥令》，安得谓之不变哉？武帝以穷兵黩武、奢淫厚敛，而盗贼起；宣帝以综核名实，而天下治；元帝以任用恭显杀肃望之而汉道衰，皆非由变法与不变法也。夫法弊则必变，安得坐视其弊而不变邪！《书》所谓「无作聪明乱旧章」者，谓实非聪明而强作之，非谓旧章不可变也。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因此，规讽。必以臣《制置三司条例司》及《看详中书条例司》，故发此论也。臣愿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为是，则当从之；若光言为非，陛下亦当「播告之修，不若厥指。」召光诘问，使议论归一。』上召光前，谓曰：『卿闻吕惠卿之言乎？惠卿之言如何？』光对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汉惠、文、武、宣、元治乱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五岁一变、一世一变，则非也。「正月始和置于象魏」

者，乃旧章也，非一岁一变也。亦犹「州长党正族师，于四孟月朔，属民而读邦法」也，岂得为时变月变邪？天子恐诸侯变礼易乐，故「五载一巡守」有变乱旧章者，则削黜之，非五岁一变法也。「刑罚世轻世重」者，盖新国乱国平国随时而用，非一世一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讲筵之官皆在此，乞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则胥史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曰：『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事有未便，即当论列。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岂可但已！」光曰：『前者诏书责侍从之臣言事，臣尝上疏指陈得失，如制置条例司之类尽在其中，未审得进达圣听否？」上曰：『见之。」光曰：『然则臣不为不言也。至于言不用而不去，此则臣之罪也。惠卿责臣，实当其罪，臣不敢逃。」上曰：『相与共讲是非耳，何至乃尔！」王沚进曰：『司马光所言，盖以朝廷所更之事，或为利甚少为害甚多者，亦不必更耳。」因目光令退。

【译文】

熙宁三年九月戊辰日，神宗第一次到迩英阁听讲读。己巳日，叫御史中丞吕公著第二天一早赶到经筵讲席。吕公著以御史台丞的职位侍奉皇上讲读经史，又在经筵兼职，遇到经筵要他讲读时就去。十一月庚辰日，司马光讲《资治通鉴》中《汉纪》，讲到『曹参代萧何为相国，一遵何故规」（曹参接替萧何担任相国，治国时完全遵从萧何订立的政策法规）时，因这句话说：『曹参以无所事事来镇平安定国家，是深得继守成业道理的精髓。所以在汉惠帝、高后执政时期，天下安定，吃的、穿的都增多了。」皇上问：『假若让汉代一直坚持遵守萧何制定的政法，历久不变，可以吗？」司马光回答：

『那里仅仅是汉代！治理国家的正确的法度规范，那怕是遵循万代，都是没有弊害的。夏、商、周的子孙，如果能坚持奉行禹、汤、文、武的法制，即使到今天，他们的朝代也可以存在下来。周武王战胜商朝后说：『我们返回实行商汤时制定的政令』，政令依然沿用旧的，即使是周代也还是用商代的政法啊。《尚书》说：「不要自作聪明来变乱旧有的典章」。祖宗订立的旧法，怎么可以改变呢？汉武帝采纳张汤的意见，把高帝制定的法典拿来，纷纷加以变更，结果天下盗贼四起；宣帝即位仍用高帝旧法，只是挑选任用了清廉能干的官吏，让他们来治理民众，因而天下大治。汉元帝即位之初，对宣帝的政策做了相当大的改动。丞相衡上书陈言说：『我真恨国家放弃这可以让人乐享其成的大业，为图虚名进行如此胡乱的改革呀！』陛下看看宣帝、元帝的为政之道，谁更好一些呢？荀子说：「有治国之人，无治国之法。」所以国家要治理好，在于得到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才，而不在于变换治国的法度。』皇上说：『人与法也是相互为表里啊。』司马光说：『如果能得到那样的人才，就不用害怕现有的法制不完善；得不到那样的人才，虽有完善的法规制度，也会因搞不清哪一条当先实施，哪一条当后实施。所以应当把寻求人才放在首位，而立法可以稍缓一缓。』壬午日，吕惠卿在讲『咸有一德』（都有一种美德）时说：『法不可以一成不变，以前君王的法有一年一变的，比如「正月一开始在阙门悬置法令」讲的就是；有五年一变的，如旧时「天子五年一次巡游」，考察诸侯对国家制度的执行情况就是；有一代人一变的，如「刑罚一代轻，一代重」讲的就是；也有百世不变的，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讲的就是。前日司马光说汉守萧何制订的政法，就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若改变它，国家就会乱。臣以为不是这样。汉惠帝废除「三族罪」（一人有罪连诛父母、妻子、兄弟）、「妖言令」、「挟书律」（藏书禁令），汉文帝废除「收孥令」（因一人犯法，即拘执本人妻与子到官府为奴

婢)，怎么能说没有改变法治呢？汉武帝以穷兵黩武、奢侈荒淫、用重税敛财，而招至天下盗贼四起；汉宣帝以能从各方面考核政令执行的名实是否相符，而使天下大治；汉元帝以任用弘恭、石显，杀了萧望之，而使汉朝的国势衰落，这些都不是由于变法或不变法引起或造成的。因此，治国的法度有了弊病，就必须变革。怎么能眼看着它的弊害而不变革呢？《尚书》所谓「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的章法」，这句话的意思是批评那些实际上并不聪明的人强作聪明来变法，而不是说旧的章法不可以改变。司马光把原意搞错，决不是毫无目的的。他肯定是由于国家近日来对许多旧的政令法规进行了更新改变，才以此来对皇上进行规劝讽喻；必是因为臣制订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与《看详中书条例司》，才发挥出这番议论。臣希望陛下能深入考察司马光所说的意思。假若司马光所说是正确的，就应当服从他；若司马光所说为错的，陛下也应当「播告之修，不匿厥指」(意思是：向大家指明司马光言论的错误所在，不隐匿他的言论的意向)。应召司马光上前加以询问，以使大家的议论归于统一。」于是皇上叫司马光上前，问他说：「您听到吕惠卿说的话了吗？惠卿所说的如何？」司马光回答说：「惠卿所说的那些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惠卿所说汉代惠帝、文帝、武帝、宣帝、元帝各朝治理国乱的事实主体，是对的。但他说先王的法制有一年一变、五年一变、一世一变，则是不正确的。「正月始和置于象魏」(正月一开始在阙门悬置法令)的，乃是旧有的章法，并非一年一变。也就犹如「州长党正族师于四孟月朔属民而读邦法」(州长、党正、族师于四季每季第一个月的初一要聚集民众宣读邦法)所说得那样。岂能因这句话得出法要季变、月变呢？天子怕诸侯私自变更礼乐，所以「五年一巡守」(每五年一次出巡考察)，发现有变换乱用既有章法的，就削其封地，罢其官职。并非每五年就要变更一次法规制度的。而所谓「刑罚世轻世重」(刑罚一世轻一世重)，完全是根据是

「新国」、「乱国」还是「平国」，随其时国况不同而采用的，不是每一世代就要变一次法。而且治理天下，就如对待自己的居室，有毛病就进行修理，除非坏得不能用，是不必更新再造的。如果非常坏了，需要更新再造，又必须能请到技艺精良的工匠，能得到质量优良的材料。当今，匠、材两者都没有，若拆掉旧房子，为臣怕连风雨都无法遮蔽了。讲筵的官员都在这里，请陛下问问他们。三司官员是让他们掌管天下财物的，因其不称职罢免是可以的，但不可以让两府侵沾他们的权事。如今，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为什么呢？宰相是以其经验、学识、才能等这样的「道」来辅佐君王的，哪有用「例」这种规定的法规条款的？如果仅仅是用「例」而已，则用一个史官就足够了。如今，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又为什么呢？』吕惠卿说：『司马光任有侍从这样的官位，见到朝廷事情有没有便宜的，就应当论次评定，有官职执掌的人，不能有效地行使他的职权，就应当罢免；有向皇上进言职责的，不能得到他有益的进言，也应当罢免他。怎么可以徒占其位而已！』司马光说：『前些时候，皇上下诏书，责令做侍从的大臣陈言变法的事。为臣曾上书指出并陈述了变法的得失。比如制置条例司之类问题，尽在其中。不知是否已为圣上知道。』皇上说：『我看到了。』司马光又说：『这说明臣不是不进言的，至于我的意见不被采纳而又不辞官自去，这则是为臣的罪过。惠卿对臣的指责，实当其罪，臣不敢逃避。』皇上说：『大家相互言语，共同讨论是非罢了，何至这种样子！』王美上前说：『司马光所说的，是指朝廷所要变更实行的事中，那些为利甚少，为害甚多的，也就不必变更了。』说着，给司马光使眼色，让他退下。

【原文】

王祂进读《史记》、光进读《资治通鉴》毕，降阶将退，上命迁坐墩于阈内御榻之前。皆命就坐，

王訑礼辞不许，乃皆再拜而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光蔀蔀，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訑对曰：『臣疏贱在阙门之外，朝廷之事不能尽知。借使闻之道路，又不能知其虚实也。』上曰：『据所闻言之。』光曰：『朝廷散青苗钱，兹事非便。今闾里富民乘贫者乏无之际，出息钱以贷之。俟其收获，责以谷麦。贫者寒耕热耘，仅得斗斛之收，未离场圃，已尽为富室夺去。彼皆编户齐民，非有上下之势、刑罚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蚕食细民，使之困瘁，况县官督责之严乎！臣恐细民将不聊生矣。』吕惠卿曰：『司马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期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所以利民也。昨者，青苗钱令民愿取者则与之，不愿者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疆，富民亦不疆也。臣闻「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昔太宗平河东，立和籴法，时米斗十余，草束八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患。臣恐异日之青苗，亦如河东之和籴也。』上曰：『陕西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也。』光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今立法许之乎？』上曰：『坐仓籴米何如？』王訑等皆起对曰：『坐仓甚不便。朝廷近罢之，甚善。』上曰：『未尝罢也。』光曰：『今京师有七年之储而钱常乏，若坐仓钱益乏米益陈，奈何？』惠卿曰：『坐仓得米百万石，则岁减东南百万之漕。以其钱供京师，何患无钱？』光曰：『东南钱荒而米粮戾，今不籴米则漕钱，弃其有余，取其所无，农末皆病矣。』侍讲吴申起曰：『光言至论也。』光曰：『此皆细事，不足烦圣虑。陛下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则陛下职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正谓此也。』上复兴众人讲论治道。至晡后，王訑等请起，上命赐汤。复谓光曰：『卿勿以向者吕惠卿之言遂不慰意。』光对曰：『不敢。』遂退。

【译文】

王祂给皇上读《史记》，司马光给皇上读《资治通鉴》完毕，下台阶将要告退的时候，皇上命人把墩搬到门槛内皇上休息的床前。让所来的大臣都就座。王美以礼推辞，皇上不答应，于是大家都再拜谢而后才坐上。在左右侍奉皇上的人都回避而去后，皇上说：「朝廷每变更一件事，满朝士大夫就议论喧哗，都认为不可以做。但是，又不能明确指出其中不利的，到底是什么事。」王祂回答说：「臣地位低，平常只能在阙门之外听旨。朝廷的事情不能详尽得知。假使能道听途说知道一些，又搞不清真实情况。」皇上说：「就根据你听到的说说吧。」司马光说：「朝廷散放青苗钱，这件事就不是有利的。如今，乡里有钱的人，乘贫穷的人缺钱的时候，拿出收利息的钱贷给他们，等到他们收获的时候，索取谷子、麦子抵债。贫苦人家冬寒时耕地，暑热时耘锄，仅仅能得到很少的收成。这些粮食，还没离开打场的地方，就完全被来要债的有钱人家夺去。他们都是编入户籍的平民，并没有上下差别的权势地位，能够施以刑罚的威力，仅仅因为富有，尚且能蚕食小民，使他们贫困、病累，更何况县官那种严厉的督促责罚呢？为臣害怕小民将没有赖以生活的东西了。」吕惠卿说：「司马光不清楚这件事。那些富有人家这样做，是想要害民；县官这样做，是为了用这种办法利民。前些天已对青苗钱借贷的事下令，平民愿取的就贷给他；不愿的不予强迫。」司马光说：「不明白利害关系的老百姓，只知借债有利的一面，而不知还债可能带来的危害。不仅是县令不强迫贷青苗钱，就是富人也不强迫呀。臣曾听说：「国家把税赋征收的标准以法定于轻收薄征上，尚且会出现贪敛的弊病」。假若法定在重敛上，那么，出现的弊病将会是什么样子呢？昔日，宋太宗平定河东，在那里实行了《和籴法》。当时籴米每斗十余钱，草每束八个钱，平民乐意与官府做这种买卖。这以后，粮草贵了，《和籴

法》仍不解除，遂即成为河东一代又一代为政的病患。臣害怕后日《青苗法》也会像河东的《和籴法》那样啊！』皇上说：『陕西实行青苗钱时间已很长了，百姓不认为它有什么不好的。』司马光说：『臣是陕西人，我在那里只见到它的弊病，没有见到对百姓有什么好处。朝廷当初并不允许搞青苗钱，而官吏尚且能够利用这种方法为害平民，更何况如今要立法允许呢？』皇上问道：『为「坐仓」而买进粮食的情况怎样？』王訑等人都站起来回答道：『采用增加仓储而买进粮食，这种办法非常不利。朝廷最近已下令停止这样做，太好了。』皇上说：『还没让停止呢。』司马光说：『如今京师已有够吃七年的储备粮，而国库钱币常常缺乏。如果实行「坐仓」，要买进粮食，钱会越来越短缺，所存的米会越来越陈，那将怎么办呢？』吕惠卿说：『采用增加仓储买进的办法，每年若能得到粮食百万石，就每年减少东南地区百万石的漕粮。用购买糟粮的钱供京师用，何必发愁国库无钱呢？』司马光说：『东南地区钱匮乏而米粮多得以至于浪费都不可惜。如今不从那里买进粮食，反而用其漕钱。这是弃其有余，取其所无，农商都会受其害的。』侍讲吴申站起来说：『司马光所讲的非常正确。』司马光说：『这些都是些具体的事情，不足以此来烦劳圣上考虑。陛下只需要选择合适的人委任其工作，有功则予以赏赐，有罪则给予处罚。这是陛下的职责。』皇上说：『你说的对。「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并不去兼知那些众人的言论、众人的刑狱、众人应当慎重对待的事情，而只是慎重选择有司牧夫而已。）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皇上又与众人讨论治国之道。到傍晚，王訑等人请求起身，皇上命人赐与汤水。又对司马光说：『卿不要以刚才吕惠卿的话而心情不高兴。』司马回答说：『我不敢。』尔后，大家就退下走了。

【原文】

三年四月癸未，司马光读《资治通鉴》『汉贾山上疏言秦皇帝居灭绝之中不自知』，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晏子曰：「和与同异、水火、醯醢、盐梅，皆相反之物，宰夫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若羹已咸复济以盐、已酸复济以梅，何可食也？伊尹戒太甲「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人之情，谁不欲人顺己而恶其逆。惟圣贤知顺之损，知逆之益，譬如酒醴，虽适口而醉人，药物虽苦口而除病。是以臣之于君，刚则和之，柔则挼之，明则晦之，晦则明之。非故相反，欲裁其有余，补其不足，以就皇极耳。若逆己者即黜降，顺己者即不次拔擢，则谄谀日进，忠正日疏，非庙社之福也。』上曰：『舜既谗说殄行，若台谏欺罔为谗，安得不黜？』光曰：『臣因进读及之耳，时事臣不敢妄论也。』丁亥，司马光读《资治通鉴》『汉张释之论啬夫利口』，光曰：『孔子称恶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主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

【译文】

熙宁三年四月癸未日，司马光给神宗皇上读《资治通鉴》，读到『汉贾山上疏言秦皇帝居灭绝之中不自知』（汉代贾山上书陈言说秦朝的皇帝已处在灭绝之中，而自己一点都不知道）一句时，由这句话向皇上说：『听从谏言获得益处，拒绝谏言遭受祸害。晏子说：「和与、同异、水火、醯醢、盐梅，都是相反相对的事物，掌管膳食的官吏，要补充其不足，减少其过多。」如果羹已经咸了，还再加盐；已经酸了，还再加梅，那怎么能吃呢？伊尹告戒太甲：「有话不顺心，一定要搞清楚他的道理。」以人的情理讲，谁不想要别人顺从自己，而不愿他反对自己。只有圣贤才知道顺从会带来的损

害，了解反逆包含的益处。比如甘甜的酒虽然适口，但醉人；药物虽然苦口，却能除病。由此来讲，逆对于君来说，刚强者则使他柔和，柔软者要鼓励他刚强；过于显露的要使之含蓄，过于隐晦的要使之明晰。这并不是故意要使之相反，而是要裁其有余，补其不足，以使符合皇帝的要求啊。假若说逆己话的人就罢官降职，说话顺着自己的人就越级提拔。那就会使阿谀奉承的人日益接近皇上，忠正刚直的人日益被疏远，这不是宗庙社稷的福啊！』皇上说：『舜痛恨那些喜欢为谗佞之说断绝君子行为的人。台谏官员欺骗蒙蔽、散布谗言哪能不罢黜呢？』司马光说：『臣是因为给皇上读史时涉及到这个问题，对于时事，臣不敢妄加评论。』丁亥日，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读到『汉张释之论啬夫能言善辩』时，说：『孔子认为坏人能言善辩，会使国家覆灭。然而，能言善辩的人怎么至于倾覆国家呢？原因是这样的人，能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把贤良说成不肖，把不肖说成贤良。作人主的若是也把是当成非，把非当成是；把贤良看做不肖，把不肖作为贤良。那么，国家覆灭，确实不难啊！』

【原文】

十年八月丙午，御迩英阁讲《诗》。上问侍讲沈季长曰：『《丰年》言秋冬报，《良耜》何以止言秋报？』季长对毕。上又问：『《丰年》不言报上帝，《良耜》何以累言报社稷？』季长对毕。上曰：『此终始之诗也。』十月庚辰，侍读邓润甫、陈襄读《史记》，因言：『司马迁史载秦汉以来君臣事迹，有不足以陈于陛下之前者，如《吕不韦传》之类是也。』上曰：『若此之类，皆阙之勿读。』沈季长、黄履奏讲诗毕，不知进讲何经，上曰：『先王礼乐法度，莫详于周，宜讲《周礼》。』

【译文】

熙宁十年八月丙午日，皇上到迩英阁听讲《诗经》。皇上问侍讲沈季长说：『《丰年》里讲秋天和冬天都要举行祭祀，《良耜》为何只说在秋天举行祭祀？』沈季长回答完毕。皇上又问：『《丰年》里不说要祭祀上帝，《良耜》为什么多次说到要祭祀社稷呢？』沈季长回答完毕。皇上说：『这是言一年春种秋收的诗啊。』十月庚辰日，侍读邓润甫、陈襄读《史记》，由此说：『司马迁《史记》上记载秦汉以来的君臣事迹，其中有不值得在陛下面前讲述的，如《吕不韦传》之类就是。』皇上说：『若碰到这一类事的文章段落，都把它空过，不要读了。』沈季长、黄履奏请说《诗经》已讲完，不知再向皇上进讲那一部经书。皇上说：『先王的礼乐法度，没有比周代更详尽的了。讲《周礼》比较合适。』

【原文】

元丰元年三月辛巳，御迩英阁，沈季长讲《周礼》《八法》，上曰：『或言邦治，或言官治，何也？』季长对毕。上曰：『然。』壬午，侍读学士吕公著读《后汉书》毕。上留公著，极论治体。至『三皇无为之道，释老虚寂之理』，公著问上曰：『此道高远，尧舜能知之乎？』上曰：『尧舜岂不知！』公著曰：『尧舜虽知之，然常以知人安民为难。此所以为尧舜也。』上又论前世帝王曰：『汉高祖武帝有雄材大略，高祖称「吾不如萧何」、「吾不如韩信」，至张良独曰「吾不如子房」，盖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也。』公著曰：『诚如圣谕。』上又曰：『武帝虽以汲黯为戆，然不冠则不见。后虽得罪，犹以二千石禄终其身。』公著曰：『武帝之于汲黯，仅能不杀耳。』上又论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业者，以其能屈己从谏耳。』上临御日久，群臣畏上威严，莫敢进规。至是闻公著

言，竦然敬纳之。丁亥，黄履讲《八柄》，上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而八柄非太宰所得与，何也？』履对毕，上曰：『然』。辛卯，沈季长讲九赋，上曰：『或言关市之赋，或言关市之征，何也？』季长对毕，上曰：『然。』癸巳，黄履讲《九式》，上曰：『宾客之式次于祭祀，而八政七曰宾，何谓也？』履对毕，上曰：『然。』四月丙寅，沈季长讲『小宰掌建邦之宫刑，以治王宫之政令，凡宫之纠禁』，上曰：『政令、纠禁，详略如何？』季长对毕，上曰：『言「凡宫之纠禁」，则是不止于王宫，又及于诸侯也。』八月戊辰，黄履讲『宰夫之职，正岁书其能者与其良者，而以告于上』，上曰：『或言诏王废置，或言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或言以告而诛之，或言以告于上，何也？』履对曰：『诏冢宰者诏冢宰而已；以告而诛之、以告于上者，或诏王、或告王及官长，皆不得专也。』上曰：『或三年、或岁终则书能否，告之以为废置。此独于正岁，何也？岂非旧岁之所考，书以告乎？』履曰：『然。』

【译文】

元丰元年三月辛巳日，皇上到迩英阁。沈季长讲《周礼》中的『八法』，皇上说：『八法中有的地方说「邦治」，有的地方说「官治」，这是为什么？』沈季长回答后，皇上说：『对』。壬午日，侍读学士吕公著讲读《后汉书》完毕，皇上留下公著，畅谈治国的体要。谈到『三皇无为之道，释老虚寂之理』（三皇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佛教、道教追求虚无清静的理论）时，吕公著问皇上说：『这样的道理，高明深远，尧、舜能掌握它吗？』皇上说：『尧舜哪能不知道呢？』公著说：『尧舜虽然深知这样的道理，但是他们还常常把能够真正了解一个人，能够使人民安居乐业，看作很难的事来做。这就是尧舜所以被尊崇的原因。』皇上又谈论前世的帝王说：『汉代高祖、武帝都是有雄才大略

的人。高祖说「我不如萧何」，「我不如韩信」，唯独说到张良时说「我不如子房」，这是因为子房学问渊博，尊敬他，所以不直呼其名。』公著说：『确实如圣上所讲的。』皇上又说：『武帝虽然认为汲黯为人憨直，但他若衣冠不整不接见。后来汲黯虽然得罪武帝，仍然以二千石的俸禄养其终身。』公著说『武帝对待汲黯，只能做到不杀他罢了。』皇上又谈论唐太宗，公著说：『太宗之所以能成就王者之大业，是靠他能够委屈自己，听从别人劝谏呀。』皇上君临天下时日已长久了，群臣敬畏皇上威严，没有敢进言规劝的。这次听了吕公著的话，恭敬地采纳了他的意见。丁亥日，黄履讲『八柄』，皇上说：『坐而论道者，被称做「三公」。而「八柄」不是太宰所能参与过问的，这是为什么？』黄履对答完毕，皇上说：『知道了。』

辛卯日，沈季长讲『九赋』，皇上说：『有一句说「关市之赋」，有一句说「关市之征」这是什么原因？』季长回答完，皇上说：『是的。』癸巳日，黄履讲『九式』，皇上问：『宾客的法式仅次于祭祀，然而在「八政」中第七个是「宾」，这是什么原因？』黄对答完毕，皇上说：『对。』四月丙寅日，沈季长讲到『小宰掌建邦之宫刑，以治王宫之政令，凡宫之纠禁。』（小宰负责宣布国家有关宫廷的刑典，用作管理王宫的政令和凡宫的纠禁。）皇上问：『政令、纠禁的内容和意思是什么？』季长回答完毕，皇上说：『书中所言「凡宫之纠禁」，则是指对违反王宫戒令行为的纠禁并不是只在王宫里，对诸侯之宫也在管理之中。』八月戊辰日，黄履讲『宰夫之职，正岁书其能者与其良者，而以告于上。』（宰夫的职责是于每年的正月，将上年宫吏中能干的和表现好的，书写记录下来，告诉他的上级。）皇上说：『文中有的地方说「诏王废置（诏告王室的废立），有的地方说「以官刑诏乂宰而诛之（以惩戒官吏的刑法诏告乂宰而杀之），或者说『以告而诛之』（上告上级诛杀之），或说「以告于上」

（以此告诉上级），这是为什么？』黄履回答道：『「诏乂宰」么，只是以下诏的形式告诉乂宰而已；「以告而诛之」！「以告于上」是说或者诏告王室，或者上告大王以及上级官员，谁都不能独断专行的。』皇上说：『有时候三年，有时在一年终了就书写他称不称职，报告上级决定罢免还是留用。唯有这里说是在正月，为什么？岂不是把对过去一年政绩考核结果写成文书上报吗？』黄履回答道：『就是这个意思。』

【原文】

三年六月辛酉，左谏议大夫安焘等上诸司式，上阅讲筵式，开讲罢讲申中书，上曰：『此非政事，何豫中书？可刊去之。』

【译文】

元丰三年六月辛酉日，左谏议大夫安焘等人呈上关于朝廷各司行事方式的奏文。皇上阅读到其中『讲筵规则』有『开讲、结束要向中书省请示』的规定时，说：『这不是政治事务，何须中书参与？可把这一条删除。』

【原文】

六年四月壬申，御迩英阁，蔡卞讲《周礼》《司市》，上曰：『先王建官治市，独如此其详，何也？』卞对曰：『先王建国，面朝而后市。朝以治君子，市以治小人。不可略也。』上曰，『市众之所聚详于治众故也。后世治市之法阙略，今可求而复乎？』卞对曰：『先王之时，有乡有遂，有朝有市，其事相须也。』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学士司马光上《资治通鉴》《五代纪》三十卷。《资治通鉴》自治平三年置局，每修一代史毕上之，至是书成。总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上谕辅

臣曰：『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辅臣请观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进入。以光为资政殿学士，降诏奖谕。

【译文】

元丰六年四月壬申日，皇上到迩英阁听蔡卞讲《周礼》《司市》。皇上问：『先代圣王设置官职管理市场，为什么唯独这里把管理市场的事务规定的这么详细？』蔡卞回答说：『先代圣王建设都城，城内前面是朝廷所在，后面是市场。朝廷管理的是王公贵族这样的君子，市场管理的是市井小人。是不可简单略过的。』皇上说：『市场是民众聚集的地方，法规的详备是用以治众的缘故。先王以后世代，治理市场的法规短缺不详，如今可以寻求加以恢复吗？』蔡卞回答说：『先代圣王之时，有乡、遂这样的行政建制，有朝廷、市场这样的城建制度，由此而发生的事务，需要那样详尽的法规。』

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日，端明殿学士司马光呈上《资治通鉴·五代纪》三十卷。《资治通鉴》自从治平三年设置编写局以来，每修撰完一个朝代史就呈上，到现在这部书完成。总共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皇上谕示辅佐大臣说：『以前的朝代未曾有过这样的史书，其水平超过荀悦编撰的《汉纪》远得多了。』辅佐大臣们请求观看这部书，皇上立即命令拿给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并下令三省官员速速进宫来拿书。同时，任命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并降下诏书给予表彰奖励。

【原文】

臣祖禹曰：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多与讲读之臣论政事于迩英，君臣倾尽，无有所隐。而帝天资好学，自强不息，禁中观书，或至夜分，其励精勤政，前世帝王未有也。自熙宁至元丰之末，间日御经筵，风雨不易，盖一遵祖宗成宪，以为后世子孙法也。可不念哉？

【译文】

臣范祖禹认为：神宗皇帝即位初期，常常与讲读之臣讨论政事于迩英阁。臣君都能倾其所知，尽其所言，没有什么隐瞒的。而且皇帝天资好学，自强不息，在内宫读书，常常读到深夜。他励精勤政的作风，是前世帝王没能有的。从熙宁到元丰末年，每隔一日都要到经筵听讲读，虽遇风雨天气，也不更改。完全是一意遵循祖宗旧定的法制，足以为后世子孙效法啊！怎么能不令人怀念呢？』

【原文】

臣祖禹拜手稽首曰：『三皇之时，至质略矣。伏羲始开人文，神农以下，皆有师。圣人之德，莫大于学。在《易》乾之六爻，龙德变化，皆圣人也。九二曰：「见龙在田」，孔子曰：『龙德而正中也，由学以聚之，问以辩之故，天下文明』。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孔子曰：『进德修业欲及时也。』至于『九五飞龙在天』，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圣人之德，莫盛于此，由学以致之也。九二、九五皆曰『利见大人』，盖非学则不能为大人，故尧舜稽古，垂衣裳而天下治』，圣学之要也。扬雄曰：『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学始于伏羲，至于成王，《易》《诗》《书》所称圣人所述，为万世法。由汉以下，其道不纯，故可称者鲜。自古以来，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学也。恭惟本朝，累圣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无虞，中外底宁；动植之类，蒙被涵养，德泽深厚，远过前世。皆由以道德仁义文治天下，人主无不好学故也。陛下广览载籍，历观前世，创业之主，守文之君，有如祖宗之皆好学者乎？由三王至于五代，治安长久，有如本朝之百年太平者乎？今人有宝器且犹爱惜之，恐其伤缺，况祖宗百三十余年全盛之天下，可不务学以守之乎！臣

又闻，学则必问，问然后为学。《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皆所以为天下法也。尧有衢室之问，舜有总章之访，动必咨于四岳。孔子称舜之大智曰『好问』仲虺戒汤曰『好问则裕』。学者，圣之先务也；问者，学之大方也。文王询于八虞而谘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重之以周召毕荣所以能成其圣也。武王访于箕子，成王问于尹佚，四圣维之，众贤翼之，是以为太平之天子，能持盈守成。夫岂由他哉？唯疆于学问而已。

今臣所录八篇，上起伏羲，下讫神宗，伏惟陛下宪道于三皇稽德于五帝轨仪于三代，法象于祖宗，集群圣之所行，体乾健之不息，则四海格于泰和，万年其有永观矣。臣拜手稽首谨上。

【译文】

臣范祖禹跪拜呈言曰：上古三皇时代，是人民至为质朴简陋粗俗的时期。伏羲首先开创了礼教文化。到神农以后，历代都有从师学习。圣人的美德，没有比好学更大的了。《易经》乾卦『六爻』中，关于龙德变化的描述，都是说圣人的。『九二』曰『见龙在田』（看到龙出现在地上）。孔子说：『龙象征大德而居于正中。通过学习可将大德聚之于身，通过询问可以辨明道德；所以，通过学，通过问会使天下文明。』乾卦『九三』说：『君子终日自强不息』。孔子解释说：『这是君子要抓紧时间进德修业啊！』至于乾卦『九五，飞龙在天』，则是指圣人与天地相合其大德，与日月融合其光明，与四季调合其行为顺序，与鬼神融合其对凶吉的判断。于是，圣人先天而行事，天不使事情的发展违背他的愿望；后天行事，则能自觉奉行天时之利。圣人的德行没有比这再昌盛的了，而这都是潜心学习才达到的啊！乾卦『九二』、『九五』都说：『只要出现有利的时机，伟大的人物就会显现出来。』然而，不通过努力学习，是不能成为伟大的人物的。所以，尧舜通过稽考古道，终于使得无为而使天下大

治，圣贤之学的要旨就在这里。扬雄说：『学习作为要为王天下的人需要做的事，这样的思想早已就有了。唐尧、虞舜、夏禹、商汤、文王和武王，他们为学习而急切不已；仲尼在成为圣人之前，为学习而惶惶不可终日，圣贤之人刻苦学习，真是由来已久了。』先人治学是从伏羲时代开始的，到周成王时已是成果至大。《易经》、《诗经》、《尚书》所记载的，圣人所记述的，已成为万世所要效法遵循的。由于汉代以后，为学之道已经不纯了，所以可以称道的圣人已经很难见到了。自古以来，天下大治的日子已少见了，而天下动乱的日子都经常见到。推究其原本，是由于为人之君王者，已不注重学习了。可令人敬佩的是，唯有本朝，各代圣上相互继承，一百三十二年来，四方没有忧患，中外达到安宁。动物植物，蒙恩被涵养，圣上德泽之深厚，远远超过前世的帝王。这都是由于我朝以道德仁义为法，文治天下，每一个君主无不好学的缘故啊！

陛下广泛阅览记载史绩的典籍，一一察看前世创业的君主，遵守成法的君王，有像我朝祖宗每一个都好学的吗？由三王到五代，国家治安长久，有像本朝这样百余年来，天下太平的吗？如今之人，家中有宝贵的器物，尚且十分爱惜它，恐怕它受伤缺损。何况祖宗创下的这一百三十余年全盛的天下，可以不务学习来好好地守护吗！臣还听到，要深入学习，必须要经常提出问题，把问题问清楚了，才能继续学习。《中庸》说：『君子为尊崇德性而去问去学，为致知广大而去穷尽精微，为达到高明至极而追求中庸之道。』这都是为天下人所效法的准则。尧帝有在衢室询问民意的事迹，舜帝有在总章寻访，每有行动必定要向『四岳』咨询的美传。孔子把舜的大智慧归结为『好问』。仲虺对商汤的告诫是：『好问则使人应付裕如。』求学是圣贤的首要任务，而多提问题又是实现学习目的的最有效的方法。周文王为了解决问题，曾向『八个掌管山泽的官员询问过，向他的两个弟弟虢仲、虢叔

咨询过；与闳天一起测度过，请南宫给他谋划过；求教过蔡原，寻访过辛尹；把周公、召公当做解决自己心中惑乱的依靠，正因为这样，文王才能成为后世仰慕的圣人。周武王寻访箕子，请他辅佐自己；周成王向地方官员、隐居学士询问治理国家的办法。以四圣的法度作为施政的纲领；以众贤作为自己的辅佐臂膀。这使他成为太平天子，使他能把先王开创的事业得到继承和发展。他们这些成就的取得，哪里是由于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唯一的就是他们比其他人在善于学习、善于提问上更强罢了。

如今为臣所编录的八篇帝学上起于伏羲，下讫于神宗。唯一的目的是想使陛下效法三皇所得之道，追随五帝的美德，遵循三代的礼仪法则；向祖宗学习，把众多圣人思想品行集于己身，身体力行，刚健不息，那就会四海至于安泰平和之中，我大宋万年延续不绝，永至大观！为臣叩首跪[illegible]上。